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8 年 12 月 30 日第 123 期（增刊）

本期目录

《外文局文革专辑 2：李超尘（李闯）专辑》

生逢乱世

李超尘（李闯） 刻骨铭心的外文局文革冤案

我对“清队”的异议受到警告

我被作为“五一六”隔离审查

瞒过“看守”半夜外出

绝食

王文政的攻心与诱供

千人大会批斗“反革命小集团首犯”

入狱第一天聆听老干部教诲

在批斗大会上声明“我不是五一六”

提审：诱我承认是“五一六”

再提审：逼我承认是“杀人犯”

大剧场批斗“杀人犯”

最黑暗的一天让我彻底醒悟

又一个“破案大会”看“表演”

林彪事件后的两次提审

狱中得知的外文局“灾情”

公安部的复查提审

改吃“营养餐”与最后的调查

难忘的会见

“老杀”们找强守一“对话”

【生逢乱世】

刻骨铭心的外文局文革冤案

李超尘（李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回炉——我的社会大学》书稿（全书稿共约34万字），内容与上期摘登的《从狂热到疑惑》相衔接。作者简介详见上期。现标题与小标题均为本刊另拟。

我对“清队”的异议受到警告

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的主任老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大老粗，紫铜色马脸，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在一个耍笔杆子的单位里，能管的事儿实在不多，大家背地里叫他“管不了”。不过，他自个儿的签名写得很帅，会“批条子”。我对他说：“方应旸不就那么点事儿么！又没什么背景，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整他干什么？”“管不了”说：“他替国民党反动派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罪大恶极！”我说：“你卖苦力扛大活（当长工），养肥了地主老财。是不是也该进牛棚啊？”他说：“你别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和方能一样吗？我那是受压迫，被剥削。”我说：“这种人多了！你清理得过来吗？”他说：“有多少清多少。这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要清除一切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说：“按我的理解，那是要清理党的组织，领导干部队伍。方应旸算什么？和你一样，曾经就是一个卖苦力的！”“管不了”说：“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苦大仇深，他和反动派穿一条裤子，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革委会”的另一个重要“官员”，也是复员兵，外号“咋呼”，他比我更加自命不凡。我对他说：“方应旸算不上领导干部，就是个搞业务的。毛主席把知识分子划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有时是革命的朋友，有时是革命的动力。”他说：“对了！那是说的革命知识分子，不是方应旸。”我说：“你们还让他怎么革命？他兢兢业业，不招灾，不惹祸，差不多天天下班回家，都带回去一大摞稿子，挑灯夜战，弄得又快又好。这不叫革命啊？”他说：“那是表面现象，装的，谁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说：“没有方应旸这么一个人张罗，拼命‘促生产’，你们那几块料就得抓瞎。”他踌躇满志地说：“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事实上，他初中没毕业就参了军，说话经常满嘴“吐猪毛”。

“革委会委员”邢根发也是复员兵，一表人材，一向心直口快。我对他说：

“清理一溜十三招，到最后方还得管业务！”邢根发说：“那倒是。”我说：“那还清理个什么劲儿？”邢根发说：“别看他吭不吭哈的，心里十分同情反革委会的人。”我说：“你不知道他怕老婆？他老婆是复员军人，革委会的铁杆儿，他敢反革委会？”邢根发说：“那也得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这就挑明了：整方，并不在乎他历史上干过什么，要命的是，他现在反“革委会”！

好一个吓唬！方应旻本来胆就小，爱面子，这一吓唬不要紧，他跳楼了！

方摔死的那天上午，“革委会”召开全社大会，“声讨方应旻自绝于人民的罪行。”下午，邢根发遇到我，悄悄对我说：“他妈的！这小子不经吓唬。本来明天就要让他恢复正常工作的！”走出两步，他又回来对我说：“可惜了一个人才！……我可告诉你，”他接着说：“你的哥们儿中有人总打小报告说你反革委会，想夺权。革委会有人盯上你了。小心点儿啊！”

听了邢根发善意的警告，我颇为后悔。人家爱怎么清理就怎么清理，关我屁事！如果我不“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就不会和“革委会”结下梁子。更何况，我算老几？说了也没用。我这只螳臂，根本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不管我这个跳梁小丑如何躲在阴暗角落里向着墙角哭泣，革命洪流照样波澜壮阔，毛泽东思想在杂志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编辑部里的“好人”日益减少，社里的“牛棚”爆满，“学习班”里的“学员”与日俱增。“黑帮”的问题千差万别，“性质”却都捕风捉影。有人在美国新闻处“当过差”，有人曾经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给蒋介石照过像”……

“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司令”艾培（爱泼斯坦）和夫人，是支持反“革委会”那一派的。一个午夜，“革委会”的两名委员，把艾培从其外文局专家楼家中的被窝里叫起来。在局大院中，艾培被塞进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五年牢狱生涯（新华社的夏庇诺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李敦白也身陷囹圄）。这一天，恰恰是艾培26年前从香港日本集中营逃脱的日子。一个小时后，他的英籍夫人邱茉莉，也被从家中带走，进了监狱。艾培夫妇的被捕，给反“革委会”的那些人造成沉重的压力。

最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物，是四十来岁的记者文××。他长得又瘦又小，本来胆小怕事，遇到点儿什么事还特别好激动，同事们说他“有点神经质”。记者到外地采访，倒不必特意修饰，但也不能邋里邋遢。这位老兄一向穿得比较寒酸，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冬天，他穿一件发白的黑皮夹克。艾培夫妇被捕后，文××从反“对革委”会变为非常靠拢“革委会”，每次批“黑帮”，必慷慨激昂，作“不共戴天”之状。有一天上午，“革委会”召开全社大会，文兄坐在我的前面，显得很活跃。“革委会”的郝“委员”，说话干脆，富于煽动性。社里人认为他

是“革委会的灵魂”，“拿大主意的人”。郝“委员”主持大会，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绝对不能高枕无忧。我们社里还有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装得比谁都革命。大家说，怎么办？”全社革命群众齐声怒吼：“把他揪出来！”坐在我前面的文兄，也跟着起哄，喊“把他揪出来”时，小鸡子似的身体居然从座位上蹿了起来，小拳头捏得紧紧的，举得高高的。不料，他的屁股刚刚落到椅子上，郝“委员”大喝一声：“文××，站起来！”立刻有两个“壮劳力”走过来，把文××“押”到众人面前。原来，他就是那个“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

接着，文兄被革命群众狠狠地批判了一顿。大家愤怒声讨他时，我却无论如何也“愤怒”不起来，总想笑。会后，文兄进了“牛棚”。从“揭发”出来的“罪行”看，他不过是“大资本家的后代”，“一个纨绔子弟”，“汉口火车站前面的一条街，两边的楼房都是他祖上的遗产”。文兄虽然“有的是钱”，尾巴却夹得很紧，一贯“艰苦朴素”，丝毫不敢露富。有一次，我跟他到外地采访，他穿着一件布满白斑的黑色皮夹克、一双掉了毛的翻毛皮鞋，袜子露着脚后跟儿，抽的是两毛钱左右一盒的烟。这类今天看起来如同儿戏的事情，当时却显得那么的惊心动魄。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文兄退休后，仍矢志不移，追随革命，终于在古稀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文兄的积极革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文翻译张希先。她的女儿作毛主席的英文翻译，她的先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唐明照，兼任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平时不在杂志社办公。当时，出身华侨世家的张女士，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着装普普通通。我们一伙年轻人称她为“张老太太”。张老太太寡言少语。别人同她打招呼或攀谈时，她也只是报以迷人的微笑，静静地“听讲”。杂志社里大批判会接连不断。每次开会，她都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闭目养神”，从未见她说过一句话，也未见她写过大字报。张女士烟瘾极重，嘴唇都有点儿发黑了。抽烟的年轻人偶尔“断粮”了，请她救济，从未遭到拒绝。如果她不在，烟民就抄她的办公桌。她那张写字台右侧的四个抽屉里，都零乱地放着一些开了封的恒大牌过滤嘴烟盒。每盒里都有烟，多则七八支，少则三四支。我在牢房里听说，1972年唐明照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张女士随夫同行。临走的前一天，同仁们才识其“庐山真面”。那一天，党支部讨论她的入党申请，与会的“张老太太”烫了发，容光焕发，原来是个“美人坯子”。当年就读燕京大学时，在那里任教的埃德加·斯诺的夫人，称其为“最漂亮的姑娘”。

外文局（不包括外文印刷厂）到底清理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听说光跳楼自杀的，就有二十来个人。《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丛书之《大事记·1949—1982》作了这样的记载：“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

揪斗、批判、抄家、隔离，有的被关进“专政队”的“牛棚”……据统计，外文局有99名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被非法查抄，其中外文图书出版社有35户，占该社审查对象的32.5%……

按照这个比例估算，外文出版社被清理的人近百，约占全社的三分之一，外文局被清理的人在200左右，约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外文局又一次成了“重灾区”！

至此，加上文革初期“反逆流”和批判“反逆流”，以及随后的批“走资派”、抓“叛徒”……文革时间尚未过半，外文局受到冲击的人数已经大大过半。

在滚滚革命洪流冲击之下，“阶级队伍”不断分分合合，弄得人们眼花缭乱，啼笑皆非。

我被作为“五一六”隔离审查

“清队”尚未闭幕，“抓五一六”就开演了。1970年初，外文局军管小组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始在外文局“抓五一六”，隔离审查了一些人。上了军管小组“黑名单”的，是两派群众组织少数大头头，群众组织中负责对外联络的人，以及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有广泛、密切联系，又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人。我并未列入其中。然而，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一向标榜“是总理批准成立的”，“反革委会就是反总理”。这一次，他们又声称“反总理就是五一六”，把我也隔离审查了。

1970年3月8日下午六点多钟，“革委会”的“铁杆儿”刘××等三人闯入我家，让我带上被褥、洗漱用品，跟他们走。

我家住在花园村东边的老虎庙。至二里沟西口新疆自治区驻京办事处，路很窄，仅有上下两车道。路两侧各有一排十几米高的钻天杨。路外大部分是菜地。那年冬天特别冷，雪格外的大。3月初逢倒春寒，连着下两场大雪，道路两旁的积雪，堆起了道道矮墙。小汽车先是沿着雪墙中间的走廊一直向东。我默默地坐在车里，晕晕乎乎的，心里就像那白皑皑的雪地一样茫然，身上一阵阵地发紧，只觉得路边光秃秃的钻天杨，一棵接一棵地向后倒下、倒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汽车七拐八绕，进入一个悄无声息的大院儿，沿着窄窄的积雪残存的柏油路行驶，又拐了好几个弯，驶到大院西北角一座灰砖三层楼房前停下。

这是一座空楼。我被带到三楼东边对着楼梯口的一间房子里。“革委会委员”“咋呼”向我宣布：根据外文局军管小组的决定，对你隔离审查。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反总理的罪行！

我被指定住在三楼东边数起第二间朝南的房间里，面积约十三四平方。上厕

所要请示，经批准才能去，三顿饭由监管人员从食堂打回来。监管人员有五位。俄文田翻译和阿拉伯文王翻译，同我睡在一个房间。“咋呼”和彭编辑住在楼梯口的那间办公室里。西班牙文翻译吴女士晚上回家，不陪我。

我既无反总理的言论，更无反总理的行为，没啥“交待材料”可写。当晚无所事事。楼外漆黑一片，寂静无声。楼里黑咕隆咚，静悄悄的。我光顾着揣摩“这是个什么鬼地方”了，没想别的，刚过九点，没经请示，就擅自钻了被窝。

第二天早饭后，四男一女“正式”对我审讯。他们坐着，怒气冲冲地盯着我。我站着，无所谓地瞧瞧男的，再看看女的。“咋呼”问：“昨天晚上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没啥可考虑的，睡的挺好。”“咋呼”猛地一拍桌子吼道：“不是让你休养来了！”吴女士被吓得一激灵，我倒没事儿一样。

“咋呼”命令：“现在就交待反总理的罪行！说！”

我见他那虚张声势的劲儿，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没好气儿地说：“我反这个反那个，唯独没反过总理，以后也不会反，没啥交待的。”

“咋呼”说：“装什么糊涂啊！反革委会就是反总理！”我说：“你们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们和总理没法比。再说，我对革委会有看法，有意见，也当面向你们说过，这算不上反革委会。我要是真想夺你们的那点儿权，领着一帮人闹一下，轻而易举。可是，我懒得这么干。”

“咋呼”说：“坦率地告诉你，别以为你们铁板一块！”他洋洋得意地说：“你的一言一行，我们都了如指掌。你的铁哥们儿都及时、如实向革委会报告。”他命令：“从现在起，你就交待反革委会的言论！”

这些都是秃头上的虱子，而且，写这样的交待材料，就跟写批判“革委会”的文章似的，何乐而不为！

趁一个人在屋子里写材料的工夫，我仔细查看了三张床、一把木椅和一张三屉桌，发现上面都有“商业学院”的标识和编号。我知道北京市有商业学院这么一号，然而，它到底坐落在哪里，却一无所知。

写了两天的材料，内容都是批判“革委会”的。甭管我说的对与错，他们看了也不会舒服，说我“借写交待材料之机，继续发泄对革委会的不满情绪，气焰极为嚣张”，又转而让我交待“五一六罪行”。

我说：“五一六是个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交待？”他们大概也闹不清“五一六”是怎么回事儿，提不出具体要求，就让我交待文革以来的活动，与社会上造反派组织的联系、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从1966年6月开始，仔细反省，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地写，一直写到现在。”

我极少参加造反派的“社会活动”，除了同在几个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有私人往来外，与其它单位的造反派没有“组织联系”。至于在外文局，我极少出头

露面，许多人知道“李闯”这个名字，却很少有人认识我这个人。虽然是个小头头，可是既无权势，也无职责，我们战斗队里的人与哪些单位有联系，干了些什么，我并不清楚。“革委会”对此大失所望。

瞒过“看守”半夜外出

过了七八天，“看守”开始有一搭无一搭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挤牙膏”，他们在办公室里侃大山，打扑克。这给了我一个熟悉环境的机会。

我们住的这座三层楼，东西长约四十米，有东西两处楼梯。三层的厕所、盥洗室，在西边楼梯旁。来回去厕所，我发现整个三层，只有我们这伙人占了两间屋子，其它房间都空着。从我住的房间的南窗往外看，二楼似乎全空着。一楼东边押着一个人，西边也押着一个人。他们俩是“热门人物”，每天上下午都有军代表坐着小汽车来“拜访”。时不时从一楼东边传出怒吼声：“刘××，你要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这才知道，那里关押着我们这派组织的“对外联络员”刘老蔫。我们三楼冷冷清清，一个“客人”也没来过。整座楼周围总是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估计原有的学生上山下乡或分配工作，各奔前程，教职员工相当部分都到外地的五七干校去了。

有一天，趁“看守”吆五喝六地打牌时，我溜出房间，到北面几间空屋子转了转。这一转不要紧，我发现这个地方离我家并不远，直线距离顶多也就“两站地”。这座楼距后院墙二十来米。墙北至花园村、老虎庙之间，是积雪尚未完全消融的耕地，其间散落着农舍、民居，还有26路公共汽车总站。喜鹊“喳喳”，乌鸦“呱呱”，成帮结伙地在地里觅食，在空中盘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令我好生羡慕。我一阵惊喜：“小子，你们白天玩，老子夜里玩！”

有了偷偷外出的念头后，我开始“老实”起来，不与他们“顶牛”，专心致志地摸他们的生活规律。田翻译和王翻译两个人，除了“三个饱一个倒”，和我照一面以外，白天基本上不到我这儿来。特别是晚饭后到就寝这段时间，根本不来。他们开着门，在办公室里打牌，以为守住了楼梯口，我就跑不了。到十点来钟，我早已钻了被窝，田翻译和王翻译才一边议论着输赢，一边来到这间屋子，锁上门，脱了衣服倒头便睡。王翻译睡在门边，早晨六点钟以前起床，到楼前打篮球，锻炼身体。田翻译好睡懒觉。到七点半左右，王翻译回来洗漱，我和田翻译才懒洋洋地起床。

田和我分睡南窗下两侧的单人床，中间靠窗放着一个三屉桌。他有一个“好习惯”，脑袋一沾枕头，必用被子蒙头，直到第二天早晨起床，才掀开“盖头”。我发现，在他俩上床前和王起床后这段时间，我完全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我来时

只穿了一双“将校靴”，如果穿着鞋开小差，必被发现，光脚走路，那是自讨苦吃。

我开始琢磨解决鞋的问题。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麻雀”！我发现田床底下放着一双圆口布鞋，他没穿过。那双鞋放的位置比较靠外。为了让他不注意自己的布鞋，我每天“帮”他往墙里推一点儿，最后，推到了墙根儿，田也没有找鞋。与此同时，我改变了睡觉习惯，一听到他俩回来就寝的声音，赶紧用被蒙头，息声屏气地平躺在被窝里，那双“将校靴”摆在床下显眼的地方。等他们关了灯，打起了小呼噜，我再掀开被子“透气”。早晨，王起床前，我又用被把头蒙上。几天下来，没发生任何意外，我决定开小差了。

3月中旬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把一堆书摆到床上，盖上被子，弄成一个蒙头大睡的样子，把“将校靴”摆在平时摆的地方，穿上田的布鞋，遛到旁边的空屋子里躲着。十点来钟，那两个“看守”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地从办公室回来睡觉。也就五六分钟的光景，门锁了，灯关了，没声音了。我把“棉猴”的帽子扣在头上，带上一个口罩，悄悄下了楼，凭进这个院子时的记忆，拐了几个弯儿（记住每个弯儿有什么参照物），用了七八分钟时间，一点儿冤枉路未走，顺利到达大门口。大铁门关着，为人进出的小铁门开着。传达室的老爷子问了一句：“这么晚了，还出去？”“唔，回家看看。”我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句，就迈出了小铁门。

门前是钓鱼台北大街。我尽量遛边儿，向东走了一段路，又顺小路往北，直奔如今的车公庄西大街，到外文印刷厂路口，向西走了一站地，大约用了四十分钟时间，到家了！

刚生的女儿留在了姥姥家。妻子见我回来，一愣：“怎么回来了？”“跟那帮狗男女呆在一起，闷得慌，就跑回来了！”我说。“这可不好！让人发现了，没事儿也怀疑有事儿。赶紧回去吧！”妻子说。“现在回去，进不去屋，得在外面冻一宿。反正出来了，明天早晨再回去。”我说。

她问了隔离审查的情况，我问了中国建设杂志社的情况。她在人民画报社工作，我们社里的情况不大了解。她告诉我：“局里没有几个人认识你，也没人说你什么。你们社革委会说你父亲是伪警察，你反革委会，别的也没说什么。”我说：“革委会那帮王八蛋，手忒黑，逮谁整谁。对反革委会的人，他们一向抓住不放，有的还送进了监狱。那帮家伙早就把我看作控制使用人员，这回又说我反总理。看样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万一他们揪住我不放，你就离婚，免得影响孩子。”妻子说：“没那么严重！你好好在那儿呆着吧！……你不是五一六，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我说：“凡事往好处争取，往最坏处准备，事到临头，才不会惊慌失措。当记者的，什么地方都去过了。这次没准儿补一课，到监狱里去

体验体验生活。”妻子说：“胡说八道！人家没把你怎么样，净自己咒自己！”

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我起床，准备去“上班”。临出门，妻子说：“以后别往回跑了，回来我也不开门。多危险啊！”

我按原路返回商业学院时，不到五点半。大小铁门都锁着，我从门顶爬进院里，回到三楼，躲在寝室旁边的空屋子里。将近六点，王翻译准时开门，到楼下去锻炼身体。我乘机溜进寝室，田还在蒙头大睡。我脱下他的布鞋，放到他床下，躺在床上与书共眠到七点多钟。

过了两天，我又觉得闷得慌，有家不能回，决定去找战友聊聊天儿。我又开了两次小差，一次乘车去现今车公庄大街新大都饭店东边的榆树馆，一次步行去魏公村，“拜访”了两位一起造反的“战友”。到4月初，日长夜短，天儿也暖和了，不便穿“棉猴”、戴口罩“化妆”出行，没有再偷偷外出。后来，强守一他们说我“跑了七次”，并把监管我的人狠狠地整了一通。

绝食

中央一声令下，北京矿业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等一些专业性大学，纷纷迁往外地“办学”，水利水电学院的地盘儿划归外文局。不久，我们“移师”水利水电学院，他们继续让我交待“反革委会的罪行”。我很不耐烦，6月间与他们大吵一架，发展到互相推推搡搡。我说：“你们把我打伤了，得去医院。”他们把我领到外文局医务室，没检查出什么来。我说：“那个伍大夫是牙科医生，当然看不出毛病来，得去合同医院。”在复兴医院门诊部候诊时，几位熟悉的同事向我“暗送秋波”。既“逛了大街”，心灵又得到了安慰，我感到很“满足”。

7月间，我一气之下，开始绝食！我要求见军代表，“说说清楚”，“我的所作所为，算不算反革委会，算不算反总理？”头三天最难熬。我越是拒绝进食，他们越是买来许多色香味俱佳的饭菜，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勾引我”。香气四溢，把我馋得够呛，闭着眼睛，直咽口水。肚子也不争气，“咕咕咕”地直叫。他们还拿我开心：“好香啊！我都馋得慌！”“不吃白不吃，伙食费从你工资里扣！”

第四天，我开始躺在床上“挺尸”，饭菜香味的刺激性小了，肚子也不觉得“空”了，然而口干鼻燥，嗓子冒烟，嘴唇干裂。第六天上午，军代表强守一来了。他像座黑铁塔似的站在床前。我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强守一的态度很强硬：“你们革委会搭军管小组的顺风车，对你进行隔离审查，与我们无关。你找不着我们！……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地接受审查？……过去，你们审查别人，那些人就都有问题吗？”

第二天，我妻子被军管小组组长施诚派来做思想工作，让我停止绝食。她说：“施诚让我转告你，军管小组确实未作过对你隔离审查的决定，是你们革委会自己搞的。你可以看一看，看管其他被审查对象的，都是全局各单位抽调的，与被审查的人没有任何瓜葛，唯独看管你的人，都是中建革委会的。”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在商业学院时，军代表几乎天天去审楼下的刘老鹳，却一直未上楼来找我。”妻子说：“施诚说了，中建革委会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全局唯一经上级批准的革委会。对他们的工作，军管小组也不好过多干预。……施诚让你注意身体，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耐心一些，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么！”施诚还对我妻子说：“你知道我们军管小组的处境，我只能和你说到这个程度了！”我妻子对此解释说：“施诚的军管小组，处境很微妙。”

1968年6月，作为军管小组组长，施诚手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红头“委任状”，带着四个部下从总参防化兵部来到外文局，“整党”和“清队”的“成绩”很大，在抓“五一六”时，“心慈手软”，“长期打不开局面”，“犯了右倾错误”。尽管此时施诚还有着军管小组组长的头衔，说话已经没有份量了。从防化兵部增派来的强守一，虽然是副组长，却是个包打天下的“大拿”。不久，外文局又来了“总理联络员”王文政，“江青联络员”施恩俊。“看样子，后来的这三个人，尤其是王文政和强守一，雄心勃勃，似乎要在外文局干一番大事业。”我妻子说。

从此，我恨透了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那帮小子！

王文政的攻心与诱供

军管小组接管了我和我的“专案”。

强守一这个人，我听过他的一次“动员报告”，又单独面对面交锋一次，给我的印象是，一身霸气，蛮不讲理。我只见过施恩俊两次。他和另外两个“主审”审我，却一言不发，面无表情。

王文政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好像是我这个“专案”的最高负责人，打交道比较多。按照他的吩咐，我写的交待材料不准给看管的人看，一律密封后转交给他。最初，我越看这家伙越像头荷兰奶牛，军帽下露出的头发有“黑白花”，胖胖的脸白里透红。

看惯了其他提审人员的咋咋呼呼，猛地一接触笑容可掬、轻言细语的“荷兰奶牛”，给我一种强烈的亲切感。他特别善于攻心，在我入狱前，从来不刺激我，总是替我着想，和我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

头一次见面，他就显得特别的“大肚”：“这都算什么呀？没有他们说的那

么严重，顶多是思想意识问题。本来想趁文化大革命捞个一官半职，目的没达到，就看什么都不顺眼，发牢骚，讲怪话。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多了！”他“轻松”地帮助我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深挖思想根源。“年轻人么！哪能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透？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这老家伙不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却反复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我心里一阵阵热乎乎的。他说：“对于你来说，我看主要还是一个加强政治学习的问题。人家都说你是条硬汉子，吃软不吃硬。不错么！拿出硬汉子劲头，好汉做事好汉当，来个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都说出来。我这个老头子帮你好好清理清理，提高提高认识，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么！听说你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你愿意总让人家这么看着？谁愿意总这样陪着你！人家早烦了。你不想回家，人家还想回家呢！”

我不知不觉地被他牵着鼻子走，结果是越走离家越远。

第二次见面，王文政张口就说：“以后，咱们不说你和革委会的恩恩怨怨。”他对看管我的人说：“你们也不许再提那些事了！”王文政接着对我说：“你们各有各的账，那一篇儿已经翻过去了。当然，你说的也有道理。他们代表不了总理。你们不是说他们是‘民办革委会’吗？他们就是民办的。总理也就是那么一说：中国建设不要乱，有个革委会挺好么！总理并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这一席话，当时把我感动得不得了。我站起来，向王文政深深地鞠了一躬，至少也有九十度。王文政“很客气”：“别这样，用不着这样！……如果你真的感谢我，那就好好配合我，把问题搞清楚。”

且看他是怎样要求我配合的！

王文政说：“你们说，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陈老总也受到保护，‘一批二保’么！因此，中央的外事工作路线没问题，外文局也就没有走资派。是不是？”我说：“我是这么认为的。”“言外之意，”王文政说，“总理应该站出来说话，保护外文局的干部？”我说：“总理说句话，当然管用了。”王文政说：“那总理没站出来说话，就是见死不救，让外文局的走资派受委屈了？”我说：“我们可没这么说！”王文政说：“别绕圈子，避重就轻。直说了吧，你们心里想的就是，总理见死不救，冤枉好人……我不是在帮你清理问题么！不但要讲你们说了哪些话，还要讲清楚心里怎么想的。”

经王文政歪歪斜斜地上纲上线，我的“反总理罪行”成立！

“（六七年）‘八一—’批陈大会，你参加了吧？”王文政问。我答：“参加了。”“你还坐在主席台上？”王文政问。我说：“是。不过，很偶然。为了安全起见，那段时间我们这派的主要大头头们，白天很少露面儿，晚上都不知去向。半夜接到电话，中央首长要接见外事口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我正好住在局里，才

拣了个便宜。”王文政说：“那就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总理的大会。”我说：“据我所知，不是那样的。至少，我们不是去反总理的。”接着，我追述了当时的情况：外文局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参加了外事口的两大派。这两大派都强烈要求批判陈老总。中央决定，把陈老总交给群众批判一次，谢富治主持，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开预备会，外事口两大派组织的代表都参加了。谢富治宣布，8月11日由我们所在的一派批陈，8月16日由另一派批，会场都设在人民大会堂主会场，规格、出席人数相等，“不偏不向”。同时规定：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会场里不准出现任何标语、旗帜，“只许文批，不许武批”，如果违犯，当即取消“批陈资格”……

“八一”那天，周总理坐在主席台一排正中，我坐在第二排，与总理相隔三四个人。主席台前右角，单设一个“讲桌”，陈老总坐在讲桌后头。大会开始后，有人讲话，批判陈老总。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纷纷到总理旁边照相、递材料。总理一边看材料，一边从眼镜上沿观察陈老总。也就有三个人发言吧，一楼会场右侧突然亮出“外院六一六”的旗帜，和“打倒陈毅”的横幅。有人前去劝阻，会场顿时大乱，“六一六”的人企图冲上主席台抢陈老总。总理站起来，观察了一会儿，拂袖而去。紧接着，从主席台右后方来了十几名解放军战士，把陈老总护送至后台。会后，大会主持人宣布：由于违反了中央的“约法三章”，取消“批陈资格”，立即散会！

王文政对我的陈述不感兴趣，坚持认为我们把“炮口”对准了总理，而且是有预谋的。我强调：“那是中央的决定，外文局两派先后都参加批陈了。”王文政说：“别扯别人，就说你自己。”我说：“我要是反总理，就不会屁颠屁颠地跑到总理跟前合影，也不会向他递材料，请他关注一下外文局的情况了。……陈老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我敢说，外文局无论哪一派的，参加批陈大会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批判陈老总去的，而是要乘机去看一看这位敢说敢为、心直口快、一直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伟大人物，听他老人家说点什么——这种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难得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六一六，保护总理和陈老总？”王文政问。我说：“有规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主席台上的人都不许乱说乱动，由解放军去处置。”王文政两只眼珠子转了转，强词夺理地说：“不反对六一六，就是支持，你们肯定是有预谋的！”

于是，我又多了一条反总理的罪行。不过，他可能也认为这样“定罪”过于牵强，此后没再追问“怎样预谋”在“八一”大会上反周总理的。

王文政问：“你说，人家把你当臭老九改造，没处说理去。什么意思呀？”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不够格，有点冤。”“没什么意思？不会吧！”

王文政说，“我听人家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意思，说半句留半句，让人琢磨不透。”我说：“真的没什么意思！改造别人的人被改造了，有些怨气。”“没那么简单吧？”王文政说，“人家都夸你，善于提纲挈领。你的意思是不是，真理没有什么标准可讲，此一时，彼一时，谁有权谁就有理呀？”我说：“我没把这件事上升到真理的高度去认识，只是觉得造反派乱用职权。”“什么叫乱用职权呀？”王文政说，“还号称硬汉子呢！这么点儿事儿都不敢承认。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怕什么？你明明认为新生的革命政权天下乌鸦一般黑么！”

这样一来，“谁有权谁就有理”，“天下乌鸦一般黑”，“革命委员会不实行王道，实行霸道”，都成了我“想”的反动言论。

王文政说：“建国以来一直反右，越反越左，现在是极左。中苏分道扬镳，一个向左转，一个向右转。这话说过没有？”我答：“说过。”他耐心地开导，帮我分析，最后总结出我有“苏联从右边修了，中国从左边修了”的“反动言论”。

王文政问：“你们说，万一林副统帅有个好歹，中央就会被动。照你们看来，林副统帅寿命不长，是个短命鬼喽！”我说：“反正我觉得林副统帅的身体，不如毛主席好……我这么说，并无恶意。我在锦州上的军校，林总曾兼任那个学校的校长，在林总的‘三只虎’（三个最得意的主力军）之一服役，没有一天不唱‘林总司令，命令往下传’这首歌。您是当兵的，肯定能了解并理解我们对林总崇拜的程度。但是，我也听到许多传言，说林总平型关大战时受了重伤，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打辽沈战役时，他几天几夜没合眼，落下了严重的病根儿，神经衰弱，失眠……打下锦州后，他曾在锦州铁路分局的‘大白楼’里，一口气儿睡了好几天，窗户都关着，窗帘儿挡得严严的，屋子里黑咕隆咚的。这一睡不要紧，形成了条件反射。据说解放后，他一严重失眠，就去锦州‘大白楼’住几天，铁路分局把楼腾出来，楼里楼外静悄悄的，房间里都按当年那样布置。我觉得，林总这样的身板儿，难以承担治国的重任。”

“这就对了么！”王文政说，“这就是说林副统帅命短么！”我那“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也就“板上钉了钉”。

有一次，王文政装出悲天悯人的模样，感叹道：“你呀，还是不成熟！有很多事情闹不明白，可以学么！学好了毛主席著作，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你有个毛病很不好！不懂装懂，还满嘴放炮，容易吃亏！”我颇不服气地说：“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倒好了，就是因为踏踏实实地学了《毛泽东选集》，才觉得毛主席说的和做的不大一样，文化大革命不大对劲儿的。”王文政的脸立马儿耷拉下来，阴沉地说：“不许胡说！已有的错误还没说清，又继续犯错误。”说到这儿，他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轻轻一挥右手，温和而又不屑地说：“算了，这句话就当

我没听见。”

“我问你，你们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命不好，动不动就被收拾一顿，还提到了焚书坑儒什么的？”王文政说。我答：“提到过。”王文政说：“那么，你的意思是，毛主席和秦始皇一个样，文化大革命就是焚书坑儒？”我说：“我们可从来也没有这么想过，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他看我有点激动，就说：“别急么！别忙着给自己开脱。咱们不是共同分析么！我看，你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我说：“没有这么联想过。”“但是，这种意思还是表达出来了。”王文政说，“要想提高觉悟，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谅解，必须在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总结问题，认识自己，批判自己。你连认识都上不去，怎么深挖犯错误的根源哪？你连病根儿都找不到，我怎么帮你治病啊？”

我和他“讨论”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以及毛主席、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论述时，颇费了一番口舌。我认为，这是我们对文革产生怀疑的重要因素，也是如何评论“刘邓”的关键，因而就自己掌握的那点儿“马列理论”，特别是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以及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有关中国国情的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及国家性质等一系列论述，说明我对文革的看法：过去的17年，好像不存在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真像中央文革所说的，“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刘邓”倒是坚持了党的“七大”、“八大”的路线，做了毛主席一贯主张要做的事儿，是忠实贯彻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表现。王文政说我“打着红旗反红旗”，“按照你的说法，毛主席没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倒是‘刘邓’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喽！”

于是乎，“毛泽东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成了我的“反动言论”——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被“誉”为“外文局少有、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原因吧！

王文政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继续革命的难题。我毫不隐晦地说：“现阶段似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新民主主义’，更符合中国国情及《毛泽东选集》的论述。”王文政说我“断章取义”，“不求甚解”，“背了几句毛主席语录，就自以为把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实用主义的毒太深”，斥责我“宣扬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不过，我认为自个儿“用其矛攻其盾”，王文政很可能觉得理亏，“拿不出手”，说不清道不明，在公开对我们批斗时，从来不提我的“毛泽东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宣扬“猫论”的“反动言论”。

王文政还把我们平时说的玩笑话，例如谁长得像林彪、江青，谁像京剧《红

灯记》里的日本鬼子鸠山、叛徒王连举……“上纲上线”予以批判。甚至说我当时的名字“李闯”有“帝王色彩”，“反动透顶”。这是一个“传统手法”。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当初批判他时，说他是“野心家，想得到整个中华”……据说，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名字很在意。一位警卫战士的名字“犯忌”，他亲自为他改了名字。我看，文革要不结束，很可能进一步从“生辰八字”入手，大挖“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

经过“荷兰奶牛”苦口婆心地帮助“梳理”、“深挖”，“上到纲和线上去认识问题”，终于为我炮制出一顶“尽善尽美”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说我是“外文局极为少有、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等我进了班房才发觉，中了这只“笑面虎”的奸计！他唯一说到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在隔离审查期间，没有在生活中虐待我，也没打我。我入狱后，这家伙才凶相毕露，大打出手。我出狱后又听说，王文政还是一头好发情的公牛，爱和“涉案”年轻女子“促膝谈心”，坐得近近的，一手抓着人家的“小手”，另一只手不停地轻轻抚摸……

千人大会批斗“反革命小集团首犯”

1970年11月6日下午一点钟左右，我躺在隔离室——北京花园村原水利水电学院东墙外、毗邻锅炉房的一幢家属宿舍楼内的一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里抽烟，负责看管我的两男一女，推门而入，让我穿上衣服“开会去”，还特别嘱咐一句：“别稀里糊涂的！多穿点儿，外面凉。”他们都是外文印刷厂的工人，几个月来，日夜“陪伴着”我。大家“处得”还行。他们没有折磨我、虐待我，还经常开一两句“小玩笑”，此刻我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跨出房门时，留下来“看家”的两个人，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目光盯着我，那里面分明透露出“可怜”，甚至含有“永别”的意思。我的心不由得一紧——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两男一女押解着我，在宿舍楼前上了小轿车。我坐在后座中间，一边一位“保镖”，那位女士坐在司机旁边。

晴空万里，和煦的阳光把人烘得暖洋洋的。这时，也只是在这时，我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的确确还活着，并非一具行尸走肉或一架造粪机器。路两边不时有一堆堆微微燃烧的树叶，把朗朗乾坤搞得乌烟瘴气。行驶了大约三四公里，汽车停在国家建工部礼堂后门外。下了车，我被安排在后台左侧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

建工部礼堂坐落于甘家口商场北侧，前门东向。北京站至动物园的103路无轨电车往来其门前。它相当于一个影剧院，楼上楼下有近1500个座位。我所在的

国务院外文出版发行局，位于东边，离这儿不到一里，经常借用这个礼堂开大会。从1966年6月至今，积四年文革之经验，我意识到，今天外文局的革命群众打算批斗我了。

隔离审查期间，我只参加过一次群众大会。那是夏初的一天，新任军代表强守一，在这个礼堂作深入开展“批查打”、“抓五一六”的动员报告。他作出“甩开膀子大干”的架势，把军帽掳在讲桌上，脱掉军上衣，披在椅背上，凶神恶煞般独自坐在主席台正中，身子在椅子上往上一蹶一蹶的，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外文局不仅有五一六，还有六一六！”“要坚决把批查打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不是“五一六”，很坦然，倒是觉得他的“表演”痕迹太重，滑稽可笑，仅仅当作一场独角戏看。坐在前排的那位来自外语学院的女大学毕业生，脸被吓得惨白！

上次听强守一作动员报告，我是被几名监管人员押解着从礼堂前门进入会场的，和革命群众混坐在一起，当“观众”。这次坐着小轿车，进后门儿，在后台的单间儿里“候场”，肯定不会与“强守一同志”平起平坐在主席台上“观礼”。我听见自己的心在“咚咚咚”地狂跳。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闯押上来！”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两个彪形大汉闯进来，用极端仇恨的目光瞪着我，恶狠狠地把我的双臂反剪着架起。我很“自然”地弯下了腰，被推到了主席台前左角。“打倒”、“镇压”的怒吼声山呼海啸。庆幸的是，押我的两个素不相识的“哥们儿”，样子凶凶的，手却不黑，没有让我像“走资派”们挨批斗那样九十度鞠躬“坐喷气式飞机”，也没有往我脖子上挂牌子。我低着头，比较轻松地弯着腰，扫视前几排的“观众”，搜寻熟悉的面孔。强守一们可能为了节约用电，没开灯。礼堂南侧的一个个大窗帘，全都拉开了。一束束阳光射进来，宛如“顶光斜照”。观众的脸半明半暗。他们口号声声，却面无表情。奇怪的是，这会儿我的心反而跳得不厉害了。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二押上来！”一声怒喝后，我的“亲密战友”王二（王宗林），被两个人从后台右侧押至前台右角“撅着”。会场上又响起一阵愤怒的口号声。这分明是冲着王二喊的。我有点为他担心。在“革命造反”时，他始终是个温和派，总是被斥为“右倾”，“胆小怕事”，几次有人要求“开除他”。如今遭此荼毒，不知道他能否“招架得住”，会不会有我这么“平静”？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押上来！”这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名字，“上台”的是一个比我显得年轻的小伙子，与王二比肩而“撅”。我突然间感到有些“失落”：完了，咱今天不能“独领风骚”了！

新一轮愤怒的口号声平息下来之后，大会主持人宣布：毛泽东思想最近在外文局又取得了两个伟大胜利，“批查打”斗争取得了两个重大战果，揪出了以李

闯为首和以×××为首的两个反革命小集团，“人心大快，大快人心！”“以李闯为首的一群披着人皮的狼，经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林副统帅，攻击伟大旗手，攻击文化大革命”；“以×××为首的成功自由人民团体反革命集团，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国家”，任命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长……“是可忍，孰不可忍！”

革命群众当然不能忍！会场上顿时响起地动山摇的口号声。接着，先后有几名革命群众代表上台，对我们声讨，批判，说我是“外文局少有的、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分子”，强烈要求“严厉制裁”。

这个大会给我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第一，这是一个贯彻落实伟大领袖关于“开短会”的最高指示的典范，庆祝两个“辉煌成就”的大会，才开了不到一个小时。第二，我觉得“针对性太差”，让我很“失望”。也许因为有另一个“反革命集团”作伴儿的缘故，作为这场演出的“男一号”，我没有灭顶之灾降到头上的那种恐惧，能镇静地支棱着耳朵，聆听革命群众的“教诲”。然而，他们只是一个劲地歌颂伟大领袖、敬爱的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以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知，那时候伟大领袖已经和副统帅掰了，正发愁呢），他们义愤填膺，但是除了给我扣上“煽动走资派翻案”、“不仅外文局少有，就是北京市也罕见”的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并没有具体地批判我的“反动言论”，只以一言以蔽之：“他那恶毒的语言是见不得天日的，如果拿出来，愤怒的群众定会把这个反革命分子砸个稀巴烂。”令我感觉“在放空炮”，“无的放矢”。我很不服气，却又不敢有所表示。

我正琢磨着自己会有个什么“下场”，大会主持人开始宣布“处理决定”，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从犯”，被叫到台上亮相，受到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李闯反革命小集团主犯王二”、另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和主犯”，监督劳动，以观后效，“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首犯李闯，交公安机关法办！”话音刚落，我身后传来“橐橐”的脚步声，四条穿着藏蓝色警裤的长腿，蹬着四只黑皮鞋奔我而来，瞬间，“咔、咔”两声，在后面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架下了主席台。身后传来阵阵“打倒”、“镇压”、“油炸”的怒吼声……

入狱第一天聆听老干部教诲

大会后我就押进公安局的一个牢房。

十六七平方的房间，打着东西相对两个地铺，中间有约一米宽的空地。十几个面色苍白的“秃子”，有的坐在铺沿，有的靠墙坐在铺里，楞眉楞眼地扫视着我和警察。

我被警察安排在“新居”的右侧（东铺）靠窗户从里往外数第三个位置。对面铺上坐着七个人。东铺这边加上我八个人。四壁和屋顶，不知道什么年代刷的白灰已经基本脱落，露出黑乎乎、表面粗糙的水泥墙。屋顶正中，吊着一个沾满灰尘的小电灯泡，估计顶多二十五瓦。门顶墙上挂着一个约二十公分见方小木匣子，里面装着广播喇叭。北墙中间，有两个紧挨着的大窗户，各有一米多高，灰窗框内直上直下插着一排拇指粗的灰色铁棍儿。

号友中有位老者很引我注目。他戴着毛线织成的帽子、玳瑁框老花镜，帽边露出花白的头发茬子，唇边颌下长着长长的白多黑少的大胡子，支起的双膝上放着一本四卷本精装《毛泽东选集》，尽管坐着，也显得个头较高，能比左边的老张高出一头多。他精神不错，似乎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两耳不闻“窗内”事。“这么大岁数还在‘这儿’坐着？”老爷子没抬头，也没说话，透过眼镜框上面瞟了我一眼。号友老白说：“他叫陈康伯，华北局的，因为反陈伯达进来的，名副其实的老炮了！”监号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他现在还很不老实，对抗改造。”老白说，“你以为他那是认真学习毛选呢？那是研究棋谱呢！”在同号们的笑声中，号友小陈一把抢过老爷子膝盖上的《毛泽东选集》，给我看。那里面夹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幅象棋残局。

听完新闻广播，好像又“自由”了。不用学习号发话，有洗脚、刷牙的，有“排队”解小便的，至于迫不及待地议论所听新闻的，十有八九都是政治犯。自打我进入这个监号，一直对我不予理睬，和我没说过一句话的“老寿星”陈康伯，开始有所“动作”了。他从铺里挪到铺沿儿，两脚放在地上，坐在那里，并示意我坐到他旁边去。他两手交叉，袖在衣袖里，放在双膝上，不看我，低着头和我聊天儿。我马上意识到，我们俩用这种姿势凑到一块交谈，队长即使从门上的小窗户观察我们，也不会怀疑我们俩在搞“串联”，也听不见我们说些什么。

我学陈康伯的样子坐着，似乎是在痛苦反省。陈康伯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是华北局的老干部，一九六六年底就进来了，“态度一直不好，不久前还和单位的人激烈辩论，不承认陈伯达是好人，否认他们加在我头上的所有罪名。他们说：陈康伯，你就这样顽抗到底，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华北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管好几个省，权力很大。在监狱里遇到“党”了，当然有些喜出望外。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进行“四项恶毒攻击”的。坐牢八年，在所遇到的三百多名“犯人”中，只有陈康伯详细了解我的“案情”。对其他犯人，我只用一句话介绍我的“罪行”：攻击文化大革命。无论政治犯、刑事犯，或多或少都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和言论。我自报“攻击文化大革命”，既不会受重视，也不会被歧视，很容易与同号相处。

陈康伯说：“你一进来，我就观察你，发现你什么东西都没带，估计是直接

从单位来的，而且是政治问题。你表现得非常冷静，‘宾至如归’，很快就与大家融洽相处了。就年龄来说，很难得。”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党内斗争原则，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你又没有到处演讲，也没有实际行动，不构成犯罪。我认为，有你那些想法的人，可能为数不少。”这话，与外文局我的专案组负责人陈明曦私下里跟我说的如出一辙，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一直琢磨，文革搞成了那副模样，连我这种“学识、水平”的人都看出问题了，“有想法”的人肯定少不了，只不过人家不说，或者没有人揭发而已。我只能算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倒霉蛋儿，撞到枪口上，“赶到点儿上了”。原来我以为顶多批斗一番，大不了开除公职遣送回乡，虽说也作了“最坏的准备”，还是没成想真给我来了这一手！

陈康伯继续说：“但是，你要作好心理准备。根据我的经验，你是羁押——把你关进监狱，不是目的。单位不会放过你，会继续给你施加压力，向你要更多的东西。因此，你要记住三条。第一，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还其本来面目。我想，最终不会把你怎么样；第二，坐牢是对人的一种考验，全面的考验，尤其是对人格、意志的严峻、残酷的考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重压之下，绝对不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假话最要不得，害人害己；第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一个正常人的心态，千万不能装疯卖傻。我见过，这种斗争方式不好。人的精神、神经活动，有一定的规律。装疯时间长了，精神和神经会按照疯疯颠颠的规律运行，很容易弄假成真，毁了自己。”

我原以为，进了监狱，就算外文局把我“处理了”，从此我与外文局已经“恩断义绝”。老爷子的话敲醒了我，让我有了精神准备。在那种环境中，在入狱的第一天，竟有这么一位素不相识、萍水相逢的老者，如此及时地、语重心长地开导自己，我的心里热乎乎的，眼睛湿漉漉的，差点儿当场表示：“请党组织考验我吧！”话到嘴边，终于没吐出来——无论从哪方面讲，那样做都有些不伦不类，不合时宜。但是，我坚定而诚恳地说：“感谢您的提醒，我一定牢记这三条要求！”

陈康伯说的“三条基本原则”，确实打动了，并且在心里牢牢地扎了根！正是在这“三条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我挺过了八年牢狱之灾，而且在重压之下，在被整得双臂差点残废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即使对“整”了我、我又一直耿耿于怀的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成员们，也没有丧失良心。

陈康伯告诉我：这个监号里的人，大多数是政治犯，有直接进来的，也有从分局转送过来的，一关就是好几年。他说：“我判断，他们的情况与你有相似之处，判也不好判，放又不好放，只好在看守所里这么关着。还有五六个人，好像是刑事犯，都是从分局转送过来的，罪都比较重——犯罪情节比较轻的，分局就

处理了。他们在这里不会呆很长时间，基本上都要判刑。政治犯比较多，学习号这个人比较正直，这个号子里还算是安定的。不过，总的来看，犯罪分子形形色色，情况复杂。要管好自己，别在监狱里学坏了。”

相处半年多，我俩还有多次私下交流，从党史到眼下的运动，我都受益匪浅。1971年3月我们分手了，但我永远铭记这位革命老前辈的教诲恩情。

在批斗大会上声明“我不是五一六”

入狱第二十天，1970年11月27日下午一点多钟，我们监号的门打开，值班队长站在门口指着我，威严地命令道：“你！出来！”

刹那间，坐在对面铺上的同号的目光“唰”地一齐投向了我。目光中含惊带喜！我身边的小刘小声提醒我：“提审！”这位见过世面的哥们儿，语调中也居然掺杂了几分激动。

我理解同号们的心情。他们待我不薄，处处照顾我，经常给我吃“宽心丸”，并传授了许多“知识”。虽说有关我是被“逮捕”还是“羁押”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是，那是他们“没事找事儿”、相互之间争强好胜的一种表现，总的来说，参加争论的人都希望我只是“羁押”，祝愿我有一个“好的出路”。今天，关于“逮捕”还是“羁押”的争论，就要有结果，分出“输赢”了！同号们都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兴奋。我坐在铺沿穿鞋，双手微微地颤抖，向牢门走去时，似乎感觉到后背“火辣辣”的，同号们大概都在用期盼的目光送我上路。

我们这个简道队长们的“班长”王杰，站在简道头上的办公室门口，穿着全套警服，外面还披着一件军绿色警察棉大衣，手里拿着的那副旧的黄铜色“洋铐子”，显得粗壮笨重，绿锈斑斑。他让我转过身去，在背后把我的双手铐上，说：“走！”他跟在我后面，我按他的口令，下到一楼，没有出通向预审楼的南门，却出了K号楼的北门，从那座红砖办公楼西侧绕到由解放军战士站岗的大铁门。一辆小轿车，头朝西停在铁门外。外文局财务处的陈明曦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站在车旁吸烟聊天。

陈明曦这个人，我越琢磨越觉得很有意思。在我隔离审查后期，陈明曦是监管人员的负责人，四十来岁，个头比我略矮，瘦瘦的，小方脸，烟瘾很重，习惯把卷烟插在烟嘴上抽。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喝水、吃饭，那个小白烟嘴几乎就没离过他的双唇。王文政和我“谈话”，他有时在场，有时不在场。我每写完一份交待材料，他都当着我的面把材料装进牛皮纸口袋里，封好，再让我在封皮上写明“请转交王文政同志”。有一次，我只写了“请转交王文政”，陈明曦说：“要写王文政同志。”我说：“费那劲干嘛！”“哎！一定要写上。”他非常认真地说，

“你不懂！这能体现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有一回，他叼着烟嘴表白：“你看，我们坚决执行王文政同志的指示，你写的材料，我们谁也不看！”有一次，他看着我往纸袋里装“交待材料”时，不无揶揄地说：“你小子不简单哪！直接通天！”我“严肃地”说：“你要是觉得好，我把这个荣誉让给你？”他赶紧说：“哼，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他总是对我似笑非笑的，严肃不起来。私下里，他以“长者”口气“训”过我几次：“李闯啊李闯，说你什么好呢！那些事儿用得着你管吗？……再说了，你管得了吗？好好管管你那张臭嘴吧！你以为就你行？就你明白呀……”我进监狱之后，他在审讯时几次说到：“你那个反革命小集团中，有的人比你的言论还尖端，更恶毒，人家就没有坐牢。为什么？态度好啊！人家态度比你好！”进班房后，我长了见识。“老师”们都说，“出路好坏依据罪过大小”，“认罪态度再好，那也是瞎掰，管预审员叫亲爹也不顶用。”陈明曦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在“打”我的态度，我却认为他在给我吃“宽心丸”儿，向我“交底”——你的问题其实并不严重！到了“关键”时刻，他会有意无意地给我某种暗示。我们两个人之间，曾有过“君子协定”，互不添麻烦，而且双方都一直恪守，没有失信。王文政对我大打出手、搞“逼供信”时，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从头至尾都没有露面儿。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明白人。最意味深长的是，我刚出狱那会儿，在外文局主楼一楼走廊里遇到他两三次。我们互相微笑点点头，都不言语，在“失之交臂”的一刹那，我们都悄悄地向对方翘起大拇指。之后不久，他就主动调离了外文局。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那天，在看守所铁门外的汽车旁，陈明曦和王杰互相客气了一下，王杰坐在前面，陈明曦和那个小伙子把我夹在中间，坐在后座上。

老号们说的真对，看守所的确有两道大门。两门之间约百八十米长的夹道，是土路，坑洼不平。临街的那座大门很气派，门洞较深。听到汽车喇叭声，从门洞南侧值班室里走出一名披着军绿大衣的中年警察，打开了两扇鲜红色的木头门，扶着南面那扇门，目送汽车驶过。

汽车出门即右拐，驶上半步桥街，向北，经里仁街、牛街……驶往外文局。突然从“洞中”来到人间，恍若隔世。车上的人都闷葫芦似地坐着。我饶有兴致地望着车外的一切，新奇之余，心情又很沉重。

冬日的太阳无精打采地挂在空中，懒洋洋地俯瞰着这座灰突突的城市。街道两侧，灰砖墙头、黑瓦房顶上已经枯黄的野草，无可奈何地随风摇摆着。不时可以看到墙面上贴着大标语：“打倒五一六黑后台肖杨余傅王关戚”，“油炸五一六分子×××”……名字上划着红叉叉，有的姓名还“头朝下”倒着写。我明白，这都是虚张声势。文革以来，打而不倒的人多了！至于“油炸”，更是说说而已。

市民每月每人定量供应五两食油，吃都不够，谁舍得用油去作践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哪！

行人很少。前些年时兴的军便服，已如明日黄花。路人穿着蓝或黑、灰色的衣裤、黑“棉窝”（布棉鞋），缩着脖子，抄着手，步履匆匆。在外文局大食堂门口，我被转交给另外两个不认识的人，押在一间小屋子里。不久，传来一声怒吼：“把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刘浩押上来！”食堂里传来一阵“打倒”、“镇压”的口号声。接着，又一声怒吼：“把反革命集团首犯、五一六分子李闯押上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成了五一六了？！”在愤怒的口号声中，我被两个人“架”进大食堂，从会场东侧通道走到南墙下，头朝北“撅”着。刘浩站在南墙下主席台（实际上就是一个讲桌）西边。他是我们战斗队的成员，但不在“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里面。

我低着头，尽最大努力扫视了一下会场。正前方约两米外，王杰披着大衣，由陈明曦陪着，坐在第一排。食堂里座无虚席，黑压压的一片，约有七八百人。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尽管在座的大多数人堪称“学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我还是觉察到，这个大会的宗旨，是批判“五一六”。可惜我得甘当配角儿，“男一号”的荣誉得让给刘浩了！

果然，大会主持人朗诵了那条“最高指示”后，又慷慨激昂地引述了“林副统帅的教导”：思想不能麻痹，要采取行动，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统统挖出来，“要刮十一、十二级台风，摧垮他们！”随后，群众代表发言。第一个发言的人，情绪激昂，言词激烈，其中有几句话好像是这样说的：刘浩，你别耍死狗，来个死不认账，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你的同伙已经揭发了，你不仅是货真价实的五一六，而且是骨干分子！接着，这位发言人引述了毛主席的论述：陕北有个旦八寨，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我们到土围子里面去扫，敌人才说：哎哟，我投降……

他爱怎么批就怎么批，想当年我“革命”那会儿，也这么干过。但是，他说着说着就大言不惭地编起了瞎话：“李闯进监狱之前，比你刘浩还硬，一进监狱就老实了，不仅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而且证明是你介绍的！”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即大声说：“我不是五一六，也不知道谁是五一六！”

会场上一片哗然，有人带头喊口号：“李闯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坚决镇压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李闯！”……押着我的两个人，虽然没打我，却使劲把我的双臂往上抬，迫使我弯腰低头，还不停地警告：“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我挣扎时，听到有人在“做刘浩的思想工作”：“刘浩，你知道，刘老蔫（在

商业学院时，关在我楼下的那位）主动交待了参加五一六的情况，受到宽大处理，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你们的邓联络员，不但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还检举了别人，有立功表现，参加了共产党。李闯和刘老蔫、邓联络，两种态度两种结果，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刘浩，你别不知道好歹！我们这是在挽救你，让你不至于落到李闯那样的下场！”

刘浩显然不买账，响亮地回答：“我不是五一六！你们先把我推到坑里，让我滚一身臭泥，再把我捞上来，这算什么挽救？！”

刘浩一向偏爱当众发表演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刹车。这小子不但要当这个批斗会的“男一号”，还要当“导演”，把批斗会变成辩论会。这还得了！那边“开打了”，有人往他嘴里塞东西，堵他的嘴。刘浩挣扎着，只听嘴里“唔唔”的，却听不清说的什么。革命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那边去了，我这边的形势逐渐好转。押我的两个人可能也累了，不再用力抬我的胳膊。我的腰松快了，然而，刚才我们仨人较劲时，大概碰到手铐了，它自动就“上了弦”。我觉得手腕子阵阵疼痛，就“摇头摆尾”。坐在对面的王杰走过来问：“怎么啦？”我说：“手疼。”他转到我身后查看，押我的俩人放开了手。王杰用钥匙捅开手铐，再重新戴上，转动了两下，试了试松紧，轻声说“行了”，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大会继续进行。革命群众向刘浩猛烈“开火”，说他曾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司令”（当时，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分成三大司令部，分别设在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联系广泛，党羽甚多，到全国各地串联，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投靠肖杨余傅王关戚，整康生同志的黑材料、冲击外交部、火烧英代办……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事实胜于雄辩”，“不管你自己承认不承认，都是一个当当响的五一六骨干分子！”还有的发言中吟诗“唱曲儿”助兴：

“商标革命造反，货色大权我篡，一语道破天机，要叫中央难办……”

“俺这里脂粉擦满脸，俺这里蓝衫换一件，解放巾描金扇，风流倜傥美少年……”

“没学过斧钺钩叉，没学过刀枪戟剑，练就一身硬功夫，为革命大耍两面，眉眼儿唤风雨，舌尖儿弄狂澜……”

我被“晾”在东边，多少有点感到失落。不过，说刘浩的那些事儿我都没沾边儿，乐得“听戏”就是了。刘浩呢？反正嘴被堵着，无法反驳，革命群众趁机把能找得到的“屎盆子”，尽情地往他脑袋上扣！好多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凭我对刘浩的了解，最有说服力的“罪过”，是“风流倜傥美少年”、“舌尖儿弄狂澜”——刘浩的确形象不错，口才极佳。

如此“不成功”的大会，居然开了一个多小时！

回看守所的路上，车上的人都不说话。我这个人喜欢搞点逆向思维，就瞎琢磨：军管小组把“五一六”定位在“与社会上造反派组织联系紧密，频繁参加社会活动的人”身上，而外文局，刘浩的社会联系最广泛，参加的社会活动最多，社会影响最大，却不是“五一六”！刘老蔫儿、邓联络是“五一六”？我就不相信，“肖杨余傅王关戚”会那么不开眼，拣了刘老蔫、邓联络那样的芝麻，丢了刘浩这个西瓜！军管小组越是把“五一六”说得神乎其神，就越可能是子虚乌有。文革以来，类似的骗局太多了。我们认真地革外文局“走资派”的命，对外宣传路线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制定的，白忙活一场！两派群众组织都说罗俊是叛徒，岂不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冒牌货”。军管小组夸下海口，要外文局抓六百名“五一六”，种种迹象表明，忙活了一年，战果非常有限，对上对下都不好交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日子怕是比我还难过。把我揪出来，应是“意外收获”，搂草打兔子捎带手！今天把我押上“历史舞台”示众，无非是要作个样子给大家看，吓唬吓唬“五一六嫌疑份子”

我被王杰送回牢房。老张、老白坐在铺位上不动。陈康伯只是从老花镜上沿儿瞄了我一眼。大多数同号都被惊动了，围上来急切地问：“谁提审的？”我说：“不是提审，回单位批斗。”“唉呀！”几个同号大失所望，退出包围圈儿，回到自己座位上。

老白没围上来，也没叹气，坐在铺上问：“哪儿的车？看守所去人没有？谁去的？”我针对他提出的问题，把大概的经过说了一遍。老白立刻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我断定，你是羁押！”有的同号不屑地问：“凭什么？”老白胸有成竹地说：“公安局捕的，没经过预审员提审就拉回原单位批斗的，我没见过。即使回原单位批斗，也由预审员带着，队长不出头露面儿——他们不管案子。”绝大多数同号对老白的说法，表示认同。“逮捕”还是“羁押”这桩公案，到此了结。

晚上，听完“新闻联播”之后，像我第一天进牢房的那个晚上一样，陈康伯又坐到了铺沿边，把我叫了过去。我坐在他身边，把回单位、挨批斗的全过程，详细地作了“汇报”。陈康伯说：“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你是羁押，仍归单位管，二，你要是五一六，就不可能坐牢——按你说的，承认五一六的人，不仅受到宽大处理，有人还入了党。这种做法与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如出一辙。当时不问真假，主动坦白承认自己是特务，就像英雄一般戴上大红花，登台亮相。有的单位还给这样的‘特务’吃平时难得一见的鸡蛋西红柿挂面，表示慰问。闹得许多一年到头吃小米南瓜的十三四岁的小战士，争当‘特务’。有个别小女孩甚至说，自己是被国民党派到延安来‘施美人计’的。三，让你坐牢，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高压手段，拿你当反面教员，推动你们单位的运动。他们的突破口越大，

任务完成得越好，你的压力就会越小。不过，根据你说的情况，你们单位的运动并未有太大进展。狗急跳墙。你要作好迎接更严重的考验、承受更大压力的思想准备！”

提审：诱我承认是“五一六”

第二天上午，陈明曦带着两个人到看守所提审。来牢房提我的两位哥们儿，我不认识。他俩一个在前带路，一个在后压阵，我们三个人出K字楼南门，径直进了预审楼的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南窗下相对摆着两张办公桌，桌后靠东西墙立着几个文件柜。往北，大约在办公室的中部，有一个正面呈半圆形的棕色“预审台”，两侧稍矮，中间较高，正面有一个红色五角星。预审台两侧墙上，贴着白纸黑字横幅，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重新作人”。陈明曦端坐在预审台后正中。提我的两个人，让我坐在门旁边的小方凳上后，在陈明曦左右落座。

陈明曦似笑非笑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故作严肃地说：“昨天你的态度很不好，应该说是很恶劣！差一点儿把批斗会搅黄了！革命群众非常气愤。”我说：“那怨你们！信口开河，胡编乱造。他们说我是五一六，还检举了别人，我不能不有所表示。我还告诉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人这么说我，我就实话实说。把会搅黄了，可别赖我！”

陈明曦正色道：“你敢！”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原来，虽然有坐牢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怕坐牢，尽量争取不坐牢。现在已经坐牢了，反而什么也不怕了。我这个人，你们也了解，一旦豁出去，什么都不在乎！不信，咱们试试？”

他们三个人互相看了看，陈明曦说：“我也告诉你！那样做，有你苦头吃的！刘浩就是一个榜样！”我说：“刘浩怎么了？还活着吧？我还告诉你们，我要是急了，可以把命搭上！”

陈明曦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收起你那二杆子劲儿吧！”停了一下，他说：“我不跟你扯这个。”他作太极拳“抱球”状，双手转动着比划，大约16K纸那么大：“现在，说说这个东西。”我很注意地看着他的手势，问：“什么东西？”他说：“问你自己！就这么个东西！”他继续比划着。

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什么呀！”他说：“你看你，装糊涂不是！一张纸！”我说：“什么纸呀？别比划了，明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他说：“哎呀！那么聪明的人，怎么糊涂了？就是你参加五一六时填的那个表！”本来已经提起来的极大兴趣，被他一语就冲散了！我泄气地说：“我不是五一六，填什么表啊？再说了，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五一六这么个组织。”他旁边的一个

人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装蒜！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别看刘浩在会上那么硬，把他收拾一顿，昨天晚上就乖乖地全都招了，还指名道姓地说，他是你的介绍人。”这小子显然是个“雏儿”，瞎话都不会编——昨天在批斗大会上，就是因为“刘浩是我的介绍人”这档子事儿，会场一度乱了套，今天这小子还要唠这嗑！

我瞟了他一眼，不屑地说：“他承认是他，我不是还不是。”那人说：“我们相信刘浩说的！凡是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人，我们都欢迎。”

我说：“那好啊！我可以和他对质！”那个人马上说：“美得你！好串供是不？”陈明曦觉出那个人“说走嘴了”，赶紧对我说：“用不着对质！现在是给你一个机会！我们还是要挽救你的！你现在承认，还算主动坦白交待，再有立功表现，就可以让你回去。”

我说：“谢谢了，这里挺好，吃穿不愁。这个机会我不要了。你们也别费劲了。王文政心里最清楚，该说的我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我不光是山穷水尽，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也许我的阶级斗争观念太差，不管你们怎么咋呼，我还是觉得，你们说的那些五一六罪状，算不了什么，没那么严重，承认了也没事儿，至少不用坐牢。”停顿了一下，我接着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说实在的，你们一直对我不错。我要真是五一六，早就承认了，你们完成了任务，我也用不着坐牢。双方都有好处，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陈明曦说：“少来这一套，别跟我套近乎！我们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把口儿封得再死，凭刘浩交待的事实，也能给你定案！”

“你们相信一面之词是不？”我说，“好，你们回去，叫王文政来，我继续配合他的工作，先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接着就说，介绍了陈明曦，再把监管过我的那些人都咬上，高兴了，我就说强守一、王文政也是五一六，都是我介绍的！”我紧接着补充一句：“如果在这儿说不管用，我就到大会上去嚷嚷！”

陈明曦不急不恼，还对我嗤之以鼻：“收起你那套把戏吧！那个时候，强守一、王文政知道你是老几呀！”

“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颇为得意地说，“肖杨余傅王关戚，我还一个都不认识呢，你们怎么把我和他们拴在一起呀？这几个人，随便扒拉出来一个，强守一、王文政给人家擦鞋、舔屁股，人家都嫌他笨……我们要是像你们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五一六，抓反革命，也能从你们那派里抓出一大堆，至少，我们早就可以把那个拿毛主席像大头朝下堵窗户的头头，送进公安局！”

陈明曦不正面回答我的嘲弄，换了个话题：“批陈老总，你去了吧？还坐在主席台上！到中南海安营扎寨，也有你吧？”我说：“我早就说过了，那是中央决定的，中央文革号召的，你们那派也批陈老总去了，也安营扎寨了，而且比我

们扎的早，营也比我们的大。难道你们都是五一六？如果你们都是五一六，我现在就申请参加。”

“你这个人哪！什么话都敢说，吃了大亏，还改不了这个臭毛病！”陈明曦说，“冲击外交部，火烧英代办，你都去了！”我哈哈一笑，说：“哎！咱还真就没去！冲冲打打的事儿，你找不着我！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事后才知道。我们战斗队的十几个人，只有一个去看热闹，别人都不知道。”我问陈明曦：“那也算反革命、五一六？那只是革命群众的过激行为！苏联人在红场打中国留学生，你们怎么不到那儿去抓反革命、五一六啊？”

陈明曦说：“你别得意，别冷笑！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早晚有你哭的时候！”我说：“我还敢笑，还笑得出来。恐怕强守一、王文政就笑不出来喽！牛皮吹出去了，要是在外文局抓六百个五一六，可是，像刘浩这样的人都不是五一六，在外文局还能抓出几个五一六？老强、老王的脸都丢尽了，怎么下台哟！”陈明曦旁边那个人说：“谁说刘浩不是五一六？他自己都承认了！”我说：“别蒙了！你自己都说走嘴了！”

我入狱后的第一次提审，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出预审室之前，我站在门边说：“看样子，你们还要拿我当反面教员，拉回去批斗。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说什么，怎么批，我都洗耳恭听，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要是有人说我咬谁了，向我提问题，让我承认点儿什么，我就实话实说，要是对我动手动脚，我就和你们拼了！”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借你俩胆儿！”我说：“用不着，昨天我已经做了。”陈明曦似笑非笑地说：“闭上你那个乌鸦嘴，别跟我这儿发表你那套个人声明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跟我提“五一六”这个茬儿。

在我的印象中，凡是陈明曦担任“主审”，气氛虽然有时很严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拍桌子瞪眼睛，也没有污言秽语，不作“人身攻击”，更没有动手动脚，或者像王文政那样明目张胆的诱供行为。

再提审：逼我承认是“杀人犯”

1970年的12月，“课外活动”特别多。第一次提审后的第四五天，陈明曦等三人又来提审。一开场，陈明曦就问：“怎么样？又想出什么新的问题了！现在交待还不晚，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愿意转变立场，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我们仍然欢迎。”我说：“我不是五一六，没什么可想的。”

他说：“咱们不谈五一六，谈别的。”我说：“我说过了，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山穷水尽了。你们看着办吧！”陈明曦说：“你呀，又把口儿封得那么死，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尽管你想破罐破摔，我们还要

挽救你，尽最大努力把你拉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他又说：“你要是早点争取主动，竹筒倒豆子，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你那个小集团的成员，有的人语言比你尖酸，比你恶毒，人家态度好，受到了宽大处理，和革命群众一起工作了么！你也知道，刘老蔫、邓联络一开始也像你一样，咬紧牙关，一问三不知，经过帮助教育，幡然悔悟，坦白了，立功了，也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么！”

我说：“我的态度也不错呀，很配合王文政的工作，超额完成了任务。我想回头，你们没把我当作浪子啊！”

陈明曦说：“你少胡说八道！什么叫超额完成任务？王文政同志冤枉你了？”我不屑地说：“他心里明白！”陈明曦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接着说：“我不跟你扯什么‘超额’不‘超额’的。我诚心诚意地告诉你，李闯！别以为一块发过誓，甚至威胁利诱，统一了口径，就万事大吉了！你们那伙人，本来就是乌合之众，不是铁板一块！树倒猢狲散，他们都在想办法为自己争取一条好的出路，谁愿意为你殉葬啊！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你不说，人家说，你不顾老婆孩子，人家要顾老婆孩子，你不革命，人家还要革命呢！”我说：“谁有，谁就说，跟我无关。反正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跟你无关？说得轻巧！哪件坏事跟你无关？”陈明曦步步紧逼，“就你一个人，死脑筋不开窍，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说：“我已经见到棺材了。K字楼就是一个大棺材。我也没落泪。”他说：“照这样下去，有你落泪的时候！”我说：“我等着，看你们怎么让我落泪。”

坐在陈明曦旁边的一个人，严厉地说：“你别臭来劲！还叫起阵来了！你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就这么大能耐，拿你没办法了？我们的办法多的是，就是铁嘴钢牙，也能撬开！”我说：“我知道，听别的犯人说过。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们了，爱咋着就咋着吧！”

这两句话，把那个看起来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人气得鼓鼓的。他还想和我斗嘴，陈明曦在桌子底下用手捅了捅他，又憋回去了。陈明曦说：“我告诉你，李闯！自从你被逮捕以后，局里的革命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形势一派大好。革命群众都说，过去被你们蒙蔽了，现在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你们的丑恶嘴脸儿，要重新认识你们，揭发你们的罪行！”我打断他的话，说：“可以想象，墙倒众人推！当然要有人趁机踹上两脚，好显示自己革命啊！”

“闭上你的臭嘴！给我好好听着！”陈明曦严厉地说，“我们没工夫跟你要贫嘴！我们在苦口婆心地教育你，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你的那些哥们儿、党羽，纷纷反戈一击，有些人甚至痛哭流涕，主动找军代表，坦白交待，揭发检举。你们犯下的种种罪行，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都已经大白于天下！想瞒也瞒不住了！”我又憋不住了，插了一句：“那不是挺好么？你们还着什么急呀？既然都已

经大白于天下了，也甭问我，该宽的宽，该严的严，按律定罪好了。”陈明曦不理我的茬儿，自顾自地按照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我奉劝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啦！纸是包不住火的！在局里，你这号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让你到这里来，不是叫你躲清静来了，而是给你创造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好好考虑问题，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搓掉身上的泥，彻底坦白交待，重新作人！”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的话里明显透露出：留在局里被宽大处理的人，日子过得很不“清静”，“人人喊打”，比我难受得多！

陈明曦假装恶狠狠地瞪了我一会儿，接着说：“你倒好！油盐不进，不知好歹，软磨硬泡，胡搅蛮缠，冷嘲热讽……我们说一句，你有十句在那儿等着！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非要过那个独木桥！你还想不想回家？想不想回单位工作？准备在监狱里呆一辈子啦？！”我说：“没办法，都是你们逼的，我也没申请到这儿来！”

“我们逼的？纯粹是猪八戒倒打一耙！都是你自找的！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儿悔过之意！你好好想想吧，年纪轻轻的，别把自己彻底毁了！”停了一下，他又心平气和地说：“我们都是为你好，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暗想：“哼，为我好？你们怎么不进来呆几天！”他见我似有所思，没说话，以为“终于打动”了我，又似笑非笑地说：“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可不像你们那伙人，动不动就一棍子把人家打死。你的态度这么恶劣，我们也要给你机会。你可要抓住了！别一错再错！”我说：“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把自个儿说得一朵花似的！你们玩儿的正是苏修美帝胡萝卜加大棒的把戏。我早看透了。”陈明曦说：“聪明！这叫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他给我留了一份“家庭作业”，让我写交待材料，“从1968年8月1日到31日，逐日写出你们的活动情况，想好了再写，不要遗漏了任何重要细节！”

要是冷不丁就让我把三年多以前的事情想全了，的确不容易。好在当年3月隔离审查初期，民办革委会那帮小子就已经让我把那段时间的事儿倒腾四五遍了，写材料的纸摞起来足有半米厚。这回旧事重提，显得驾轻就熟，不到一周时间，我就交了差。

看完材料，陈明曦等三人来找我“算账”。坐在陈明曦旁边的一个小伙子，一上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叭！”把我写的材料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说：“写的这叫什么呀？”

“交待材料啊。”我说，“都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写的。”“纯粹是一份豆腐账！谁叫你这么写了？”那个小伙子吼道。我说：“你们让我写详细点么！就差把拉屎撒尿吃饭睡觉的事儿也写上了。”“让你写吃喝拉撒的事儿了吗，啊？”那个小伙子咄咄逼人地说，“避重就轻，耍花枪！我警告你，姓李的！照这样下去，到

时候想哭，你都找不到坟头儿！”

“白脸儿”唱罢，“红脸儿”出场。“好话说了千千万万，你都当成耳旁风！”陈明曦装出悲天悯人的姿态说，“李闯啊李闯，说你什么好呢！我可提醒你，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哪！可别不再当回事儿！剩下的时间的确不多了！你千万千万要把握住这最后一个机会！失掉这个机会，你可就彻底完了，谁也救不了你了！”

写这份材料时，我就直犯嘀咕：一而再、再而三地抖落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意思？莫不是，还要搜寻一些蛛丝马迹凑材料，把我打成“五一六”！如今听他们的口气，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这帮小子没憋好屁！我对他们说：“我写的都是实际情况。不信，你们可以去核实，我又没生活在真空中！我自己做了什么事儿自己清楚，用不着你们操心。”

陈明曦说，“是不是事实，不能光听你一个人说，我们已经核实过了。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你们用实际行动写成的历史了，任何的粉饰、掩盖、编造，都篡改不了血写的历史！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现在，是让你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重现你们的罪恶历史！”

“我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我说，“有什么话，痛快点儿，明说，别绕弯子，云山雾罩，悬悬乎乎，玩猫捉耗子那一手。”“猫捉耗子，什么意思？”陈明曦问。我说：“猫抓到耗子以后，不一下了把耗子吃掉，还要玩一会儿，放开耗子，又抓回来，抓回来再放开，玩够了才一口吃掉。你们就在玩这个把戏。”

笑意在陈明曦的眉眼间转瞬即逝：“你还挺能比喻啊！你说说你，没事儿净瞎琢磨这些没用的东西，要不，材料怎么也写不好呢！有那功夫，你好好想想怎么尽快把自己的罪行都交待清楚，总琢磨我们干嘛！就算你是一只耗子，我还不愿意当猫呢……李闯啊！我们不想把你吃了，我们在给你机会，想拉你一把！你怎么就不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呢？！”

我说：“看把你急的！想知道什么，明说，我再详细告诉你，别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又来了不是，见空儿就钻！你要是真关心我，痛快点儿，把那点不可告人的东西亮出来！”

我说：“那你问吧，也别让我着急！想知道什么？我说了，还能算你坦白交待吗？”陈明曦陡然间“翻脸”了，“给你机会你不要，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偏偏要去过独木桥！”旁边那个小伙子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敬酒不吃，吃罚酒！”

胡扯了半天，毫无结果。最后，他们让我“专门写8月21日到23日的活动”，“一天一天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写出来！”

写这种玩艺儿，就如同炒冷饭。一天多时间，我就炒出来了。

大约12月23（24？）号，陈明曦等三人又来了。这一次，他们的表情极其严峻。刚一落座，一个个都乌眼鸡似的，逼视我，不说话，接着就劈头盖脸连珠炮

似的，暴风骤雨般“端正我的态度”，什么“混世魔王”、“草菅人命”、“杀人眨眼”、“血债要用血来还”啦，什么“蒙混过关”、“瞒天过海”、“视无产阶级专政软弱无力”、“视革命群众软弱可欺”、“只有不要脸的人，才会说不要脸的话”啦，等等，等等，把他们凡是能收集到的“狗血”，都往我头上淋，斥责我“死到临头”，还“故作镇静”，“把革命群众当猴耍”！猛烈的炮火，把我轰得如坠五里雾中，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最后，他们喝令我：“站起来！”陈明曦“余怒未消”地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说：“材料里写了，在宿舍睡觉啊！”“我不看你写的那破玩艺儿！”陈明曦说，“你现在说实话，到底干什么去了”“在宿舍睡觉啊！”我说。“在哪儿睡觉，跟谁在一起？”他问。“田兄、于兄，四楼！”我答。“胡说八道！”陈明曦说，“我们调查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说：“那是他们记错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坐在陈明曦两侧的人，“腾”地站起来，他们三个人又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却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嚷嚷得我耳朵根直疼。费了好大劲儿，我才听清他们说的大意：“撒谎”、“骗人”、“装傻充愣”、“掩盖罪行”、“金蝉脱壳”、“都是别人记错了，就你脑袋好使”……我愣愣地看着他们那一张张显得有点变形的脸，不知说什么才好，心里想：就算我记错了，又怎么了？至于么？

狂轰滥炸过后，那两个人坐下了，我仍然站着。陈明曦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杀人魔王！”哟嗬！这帮小子还真就凭我睡在哪儿这一点，作出了大文章！

我的阿拉伯文老师说的有道理：一拳难敌十手。一对一地说话，就比较从容了，我立刻反唇相讥：“我是魔王？你们好！你们多好啊！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不像我们一棍子把人打死，那是你们嫌一棍子打死不过瘾，要用两棍子把我打死，让我活受罪！”坐在陈明曦旁边的，可能是外印厂的一个工人，听不出话的意思，“嚯”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问：“谁打你了？我们什么时候用棍子打过你？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明曦聪明，拉了拉那个人的衣襟，示意他坐下。我说：“明摆着，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还不解气，又说我是杀人魔王！这顶帽子可比五一六大多啦！”

“不是我们说你杀人，”陈明曦说，“是你们犯了杀人罪！”我愤怒地说：“血口喷人！”我感觉到自己气得有些发抖。陈明曦两边的人又蹿起来，指着我异口同声地说：“老实点儿！不许你乱说乱动！”陈明曦幸灾乐祸、一脸坏笑地瞧着我：“捅到痛处了吧？紧张了吧？”我瞪了他一眼，说：“有什么可紧张的！”

“那你哆嗦什么？”他问。“让你们气的！”我答。“脸都吓白了！”他嘲弄说。我突然觉得这件事儿有点离奇、可笑，就没好气儿地说了一句《智取威虎山》中

的“戏词儿”：“防冷涂的蜡！”

他们大概没想到，在那么针锋相对、异常严峻的气氛中，处在被告席上的我，会冒出这么一句“台词儿”，都不禁一愣，又显然费了很大劲儿才憋住没笑出来。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儿滑稽，露出了得意模样。陈明曦故作“极其严厉”，说：“严肃点儿！死到临头，你还笑得出来！难怪革命群众说你们都是亡命徒！”此刻，我已经意识到，跟他们生气不值得，再说，审讯么，“兵不厌诈”，爱编什么就编去吧。于是我平静地说：“是不是亡命徒，让事实说话。”

“嗨！你也好意思讲事实！”陈明曦说，“你要是讲事实，就不会时至今日，仍然拼命捂着盖着！”我梗着脖子不说话。陈明曦说：“六七年八月二十三号，局里发生什么重大事实了？说！”

我想了想说：“除了李翻译跳楼自杀，没别的了。”“说得轻巧！跳楼自杀！”陈明曦吼道，“是你们打死的！”他两边的人又来劲儿了，“嚯”地站起来，指着我喝道：“说！怎么把她打死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小子！你们葫芦里原来装的是这副药啊！我更加平静地说：“不是我说。跳楼自杀的结论，是公安局作的，你们问公安局好了！”我又补充说：“你们得感谢公安局。要不是他们作了结论，我们还怀疑你们杀了她呢！”

我恍惚记得，听人家说，李翻译三十多岁，旅日归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的，矮矮胖胖，有点罗圈儿腿，平时不大爱说话，死前不久离异，住局大院西楼单身宿舍。

在外文局这么一个书卷气特别浓、“文质彬彬”的单位，“有史以来突然非正常死亡一个人”，闹得满城风雨，议论纷纷。我们这派有些“阶级斗争观念”格外强的老头、老太太，不断来找我们，神情严肃地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她刚宣布退出对立派组织，就不明不白地死了，会不会因为掌握了对立派的核心机密，被“杀人灭口”了？他们说似乎很有道理：她住在四楼，真想自杀，为什么不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往外跳，却偏偏舍近求远，穿过一大段走廊，从对着局大院西门的北窗跳下去……他们忧心忡忡地建议我们“查一查”。我们查了，也没发现“杀人灭口”的迹象，公安局法医又作出了解剖鉴定，下了结论，便不了了之了。当时，我们还认为“那帮老头老太太神经过敏”。正如陈明曦所说，我们这派组织确实是“乌合之众”，然而，外文局又有哪一派造反组织，不是乌合之众——无纲领，无章程，无组织原则，无组织纪律，最重要的是无财政，都心安理得地拿着“政府”给的俸禄、肆无忌惮地跟着头头造“政府”的反，没有凝聚力，没有约束力，有他妈的什么“机密”可言？本派的头头之间，互不服气，总是争争吵吵，指责你“左”了、他“右”了，动辄声言把自己的那部分人马拉出去单干……我所以“落入法网”，完全是本派“战友”搞的，祸起于萧墙之内……

我告诉陈明曦：“我们调查了一溜十三遭，找不到可信的杀人动机，也找不到杀人现场。”陈明曦对此很感兴趣，“顺竿爬”问我：“你们是怎么找杀人现场的？”还让我坐下说。

我说：“有人怀疑，你们那派在车库里毒打她，再移尸。可是，每天晚上车库里都摆满了汽车，根本就没有可供打人的空地儿，而车库临街，在大门口，司机中两派的人都有，夜里常有人值班，不合作案。有人说，你们那派把主楼地下室当作总部，那地方绝对保密，有好几层厚厚的铁门，你们可能在那里处理她。可是，地下室离她死的地方太远，移尸困难。还有人说，你们在铺设暖气管子的地道里打她，然而，那里面太狭窄，凶手根本施展不开。除了这三处，别的地方作杀人现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你们那派听到了风声，为了避嫌，很快就把总部搬出地下室。我们这派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光复地下室’，还组织群众到地下室去参观，看你们的‘杀人魔窟’……至于李翻译为什么不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往下跳么，到现场看看就明白了——房间窗下，紧挨着宿舍楼的墙，有一排平房，是书库，跳下去可能摔个半死，岂不活受罪。”

陈明曦他们听了我的陈述，眼睛里大放光芒，一口咬定：“这就是一个杀人魔王绝妙的自供状！”

真是奇谈怪论！

陈明曦说：“你们打死了人，精心选择作案地点，还装腔作势地调查别人！什么叫贼喊捉贼？这就叫贼喊捉贼，欲盖弥彰！”我轻蔑地说：“别没事找事儿，抠缝下蛆！拿这件事儿整我，就不怕人家笑话你们？”陈明曦得意地说：“笑话什么？挖出了一个杀人团伙，革命群众拍手称快还来不及呢！要说笑话，那得笑话你们！笑你们愚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别在这儿卖关子啦！你以为我们现在才知道啊？告诉你吧，你的那些哥们儿早就交待了，就你一个人还在负隅顽抗呢！”我说：“狗屁！我在好心好意地说明当时的情况，你们却以为捞到了稻草，拾人牙慧，把我们已经否定的东西当宝贝，当证据，有什么值得兴奋的？谎言止于智者。你们要是凭这个说我杀了人，只有二傻子才会相信！”

“少在这儿冷嘲热讽，拐弯抹角地骂人！”陈明曦说，“刘浩他们已经如实交待了杀人经过。事实胜于雄辩！”

我想，凭我对刘浩他们的了解，他们绝对不会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刘浩当过首都红卫兵一司的司令，大串连那会儿几乎走遍全国，注意力或者说精力并未放在外文局这个小水池子里。他比我大两岁，血气方刚，真要是“为革命”杀了人，那可是大功一件，无论如何也会在言谈话语中有所流露，甚至毫无顾忌地到处显摆。我和他们关系密切，他们要是杀了人，我不可能一无所知。于是，我一口咬定：“他们不会杀人。”

陈明曦说：“甭嘴硬，有你服软的时候！”他旁边的人厉声问：“你敢给他们打保票吗？”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他们说：“有胆量，你写下来！”我这个人架不住“将”，马上说：“写就写！”随后，我就当着他们面写了一份“我保证，刘浩他们不会杀人”的“保票”。

不管我怎么说，即使有那个“保票”，陈明曦他们还是满怀着胜利的喜悦，打道回府了。

大剧场批斗“杀人犯”

12月29日下午，陈明曦等三人来提我。在筒道头的队长办公室门口，他们把我双手铐在背后。陈明曦说：“今天，革命群众批斗你，老实点儿，别像上次那么猖狂！”我说：“我已经说过了，只要没人向我提问，说我承认了什么，你们爱说啥说啥，我好好听着就是了。”陈明曦似笑非笑地说：“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没人理你这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是他首次明确表态，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就算达成了。

这一次没有看守所警察随行。汽车没有奔外文局，开到了北京展览馆剧场。我被带到后台的一个小房间里，单独“候场”——按照文艺团体演出的惯例，只有“大腕儿”才有这样的待遇。

北京展览馆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东侧，外文局北边约两公里。这个庞大的俄式建筑群，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援建的，原名“苏联展览馆”，有展厅、餐厅、影院，圆形剧场有一千多个座位。我在这儿的“莫斯科餐厅”吃过俄式大菜，那时候的菜价很便宜，一道“凤尾虾”才三块钱。今天我却要被当作鱼肉，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我在这儿的影剧院，看过电影和歌舞，今天不知道让我登台唱一出什么戏？！

时过不久，只听有人喊：“把反革命杀人犯张仁杰、杨士义、刘浩押上来！”随后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口号声。我不禁一愣：这三个人都当过兵，张仁杰来自中央警卫团，据说是那位《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的战友，任局保卫处长，杨士义是局机关的干部，不知道他们三人把谁杀了！这个念头刚在我脑海里闪过，又听到有人喊：“把反革命杀人犯李闯押上来！”我暗暗地骂了一句：“这群王八蛋！到底还是给我做了一顶杀人犯的帽子！”我的气儿不打一处来，准备寻找机会搏一搏。到了舞台前左角的第一道“立幕条”边，我的气儿又消了一大半儿——押解我的两个人只在后面“扶”着我的双臂，没让我给观众“鞠躬”，轻轻地命令道：“低头！老实点儿！”比上次批斗会的“待遇”要好，没“坐飞机”。这么大的场面，人家如此“照顾”咱，咱得“配合”人家的工作，的确应该“老实点儿”。

舞台上的光线比较暗。我斜视一下右方，旁边一个全身裹着纱布的主儿，躺在担架上，只露着两只咕噜噜转的黑眼睛。隔着“讲桌”，张仁杰和刘浩各被两个人反手按押，呈九十度以上“撅着”，头都快顶着地了。

宣布开会之后，主持人向革命群众“隆重”地“介绍”了各位“人犯”。遗憾的是，没打“追光灯”，不知道观众能否看清“真相”。点张仁杰、刘浩的名字时，他们俩分别被人揪着头发，仰起脸，亮了亮“尊容”。点杨的名字时，有两个人把担架一头提起来，展示了一下他的“惨像”。点我的名字时，押我的人没动手动脚，只是口气轻轻地命令我：“抬起头来！”我遵命略微抬了抬头，让革命群众观赏了一下我的丑态。接下来，有好几个革命群众上台，揭露“残害对外宣传战线上的优秀女战士李翻译”的罪行，愤怒声讨杀人主犯杨士义抗拒审查，跳楼自杀，自绝于人民的丑恶行径。有几个“杀人犯”先后上台，“交待行凶经过”——不怪陈明曦说，他们中真的有人“痛哭流涕”，“坦白交代”，至于杀人场所，其说不一，有说在外文局主楼地下室的，有说在车库或暖气地下管道内的。发言的人当中，点我名的极少，但是，无一例外都说张仁杰、刘浩、杨士义是主谋，每当点他们的名时，张仁杰、刘浩都一通挣扎，嘴里“唔唔”的，显然被堵着什么东西，杨士义只能静静地躺在担架上，一声不吭。因为我和陈明曦有言在先，人家不让我“坐飞机”，既未声称我“认罪”，也未说我“咬”了谁，没有违背“君子协定”，所以，咱也不好造次，只是耐心听他们胡说八道而已。

按照惯例，大会结束前宣布处理决定：从犯一律从宽处理，不予追究，主谋和主犯张、杨、刘交公安机关法办。话音刚落，从后台走过来六名警察。我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人把担架一头提起，两名警察把杨的双手在身前铐上了。我跟在那三位被警察双双押解着的人下台时，百感交集中，突然萌发了一种强烈的冲动，特别想亮开嗓门冲着那三位当过兵、戴着手铐的人高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我们四名“人犯”各有专车。回程路上，陈明曦不无得意地向我“表功”：“怎么样？我们没有食言吧！对你怎么样？”我说：“还行，没让我撅着。”“我跟他们说了，”陈明曦说，“只要你老老实实，就对你客气一点，不让你坐飞机。”我说：“这还差不多。照这样，以后我还配合你们的工作。”陈明曦说：“不像你们！我们讲究政策，区别对待。”我心里想：去你的吧！你们问心有愧，又怕我折腾！“不过，”我说，“你们也够损的，选这么个日子抓人。”“怎么了？”陈明曦奇怪地问。我说：“再过两天就是元旦。让他们过完新年再进来，也耽误不了什么！”他们三个人显然对今天能“顺利过关”（我没捣乱）感到高兴，有一个人竟然插科打诨道：“不知道好歹！怕你一个人在里边过年太孤单，让他们给你作伴儿！”我认真地说：“谢了！白费苦心，我根本见不到他们。”

这件“案子”，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说他们没杀人吧，那么多人上台交待杀人经过，杨也是的，要是没杀人，你怕个毬！干嘛跳楼自杀呀！伟大统帅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论持久战》中又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这个原则，与政治联系着。真要是死了，谁替你申冤？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好为自己辩护。

说他们杀了人吧，好几个“凶手”跟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我怎么一点儿也没觉察！他们说的杀人现场，又都是被我调查研究后断然否定过的地方，如车库、地下室等，尤其是地下室，李翻译死时那里是对立派的总部，张仁杰他们会到对立派的总部那里、当着对立派的面杀人？真是咄咄怪事！如此自相矛盾，如此驴唇不对马嘴，强守一、王文政们居然还腆脸声称“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外文局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再说，上台交待罪行的“凶手”们，有几个人“同派不同宗”，关系有如“冰炭”、“水火”，平常这两拨人见面就“掐”，唇枪舌剑争论不休，讽刺挖苦，吵得一塌糊涂，多次扬言要分家另过。他们怎么会合起伙来干杀人的大事呢！既然张仁杰、刘浩是铁定的凶犯，“自己都承认了”，那干嘛还要堵他们的嘴呀？

我始终闹不清他们“为什么杀人”、“杀人之后得到了哪些好处”。对“杀人犯”的处理，也存在很大的漏洞……咱不是“法盲”。上初中一年级时，学校分上下午班，我妈在区法院作人民陪审员，我常跟着老娘去区公安分局、法院、街道派出所“上半天班”。大人们分析、研究案情，我在旁边写作业。我听出来了，钝器、锐器、撞击、坠落造成的伤痕，各有各的特征，犯故意杀人罪的人，即使自首，也得判上几年，团伙作案，分主谋、主犯、从犯，根据“情节”定罪，分得很细——谁使用什么凶器，打在什么地方，谁打的那一下是致命的……哪能像外文局这样，稀里糊涂，只追究主谋、主犯的法律 responsibility，而放过从犯呢？

破案大会之后，好几天也没人理我、问问我的感想。

八天之后，1971年1月6日上午，中国建设杂志社的郭翻译、刘翻译和炊事员任××来“接”我，又是在队长办公室门口，把我双手铐在背后。坐的是中国建设杂志社自备的黑色“雪佛兰”，没有警察跟着。到了外文局，他们把我带到主楼二楼东侧一间朝北的大办公室，交给陈明曦“验明正身”。陈明曦正色道：“中国建设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批斗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批吧！”我说，“我还是那个态度”——意在强调那个“君子协定”。陈明曦说：“我知道！甭费话！”

办公室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在西南角。室内分三处，两两相对地摆着

六个办公桌。我被指定坐在对门靠窗的办公桌前，等候出场。正是机关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在我面前放了两个馒头。在监狱里，这东西无异于“三鲜馅饺子”、“狗不理包子”，但是，咱得“端着点儿”，无论如何也不能“掉价儿”。我说：“不吃。在监狱里饿不着。”拿馒头的人说：“嘿！你小子不识抬举啊！”一石激起千层浪，办公室里的几个人，七嘴八舌地“称赞”起我来。有的说我“瘦驴拉硬屎”，有人说我“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陈明曦踱过来，说：“犟驴，打着不走，牵着倒退！别总摆着一副大义凛然的架式！”又有人颇有点儿幸灾乐祸地说：“李闯！你老婆要和你离婚啦！”我立刻说：“离就离！吓唬谁呀！只要她提出来，我就同意签字！”

此时，陈明曦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二杆子劲儿又来了是不？我可提醒你，你和人家不一样！人家是羁押，你是逮捕！好好想想，啊！”走出两步，他又回过头来说：“充硬汉子有什么用？聪明人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就得软！”

他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意义”万分重大！他所说的“羁押”、“逮捕”，显然是一句“反话”，是一个暗示，再者，仅仅于12月29日强守一、王文政在展览馆剧场气势汹汹、轰轰烈烈地把我打成杀人犯后的第八天，陈明曦同志还能说上这么几句话，份量之重，何止千钧！他绝对是位“智者”，知道杀害李翻译之说，纯属弥天大谎！时至今日，每每想起陈兄的这个暗示，我仍然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其它的恩恩怨怨，全都不在话下！当然，也不能说强守一、王文政就是蠢猪，他们只不过是秉承“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旨意，昧着良心一味蛮干罢了。

下午，上班时间一到，我被押到主楼四楼东侧朝北的中国建设大会议室。两年多以前，也是在这里，我靠北窗站着，当着全社员工的面，同民办革委会的“管不了”，针锋相对地大吵一架。今天，我得在这里向全体员工“低头认罪”，接受他们的批判。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本来就没有“台”，也就没有台上台下之分，除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中间只留了大约两平米的空地供我“撅着”。虽然陈明曦没到场，但是那个“君子协定”显然继续有效。自始至终，无人向我发问，也没人说我承认了什么，“咬”了谁。实际上，革命群众也比较难以启齿——我的那些“反动言论”，不好拿出来批判，说是“谨防扩散”，实则怕引起共鸣，只好在“煽动走资派反攻倒算”、“批判陈老总”、“中南海外安营扎寨”、“冲击外交部”、“火烧英代办”这类问题上作文章。发言的革命群众，不时向我过去的那些“战友”严厉地提问，让他们站起来回答。不管问什么，他们都好像不假思索地、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是”，“我错了”，有人还说自己“有罪”，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风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一，民办革委会委员都没露面，没人“咋咋呼呼”，也无人批判我

“反革委会的罪行”，二，也无人提及“杀害李翻译的罪恶”。在右边“架”着我的那位年轻的刘翻译，只是轻轻地“扶”着我的右臂。令我很不欣慰的是，在左边架着我的那位五十岁左右的炊事员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不是个良善之辈，隔一会儿就使劲抬抬我的左臂，用膝盖顶我的腰，狐假虎威地喝斥：“低头！”“老实点儿！”他们这一老一少，动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弄得我的上半身右高左低，老是侧歪着。批斗会开了约一个小时，“不欢而散”。

最黑暗的一天让我彻底醒悟

1971年对我来说，比1970年更加的“流年不利”。中国建设杂志社开的那个批斗会，成了我的“开门黑”。这一年过得似乎极其漫长，“一天等于二十年”，却又无所事事，值得记忆的东西不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少有的三四件事，喜忧掺半，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一月初的批斗会之后，我在看守所里“平静”地呆了两个月。2月末3月初，我迎来了一生中最“黑”的一天。那天下午，队长把我叫出牢房。三个穿便衣的人，等在队长办公室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这三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瞎琢磨：老相识（陈明曦）怎么没来呀？是因为“立功”高升了，还是因为“犯事儿”也进来了……不是我咒他，盼他有个好歹，而是外文局的形势太令人琢磨不定，瞬息万变，无中生有、故弄玄虚的事情，层出不穷，难免使人有朝不保夕之感！

来的三个人中，显然负点儿责任的那个人，三十来岁，比我略高稍胖，方脸上有许多疙瘩，红鼻头儿。不仔细看他的眼神，就分不清生气还是高兴，因为无论喜怒，他都呲着上牙，脸上的器官往鼻子靠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外文图书出版社的缅甸文翻译——十年后，我们成了家门对家门的邻居，他仍然是我的领导：居民小组长。

他们三个人把我拉回外文局，带到主楼一楼东侧一间朝北的大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在西南角。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三屉桌，朝西摆在东半部正中，周围有三四把椅子和一个方凳。水泥地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地脚螺钉的残迹。根据我在长春六中作车工的经验判断，这间屋子里曾经安装过几台不大的机器。依稀记得，墙上还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标语。

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强守一、王文政不断地把外文局的老少爷们儿投入监狱，他们自然要经常往监狱跑，提审“人犯”，顺便学到了许多“知识”，增长了

才干，照猫画虎地开辟了这么一间专用的“审讯室”，就是一个明证。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王文政为我准备的“白公馆”、“渣滓洞”。

我进屋以后，他们扳着脸，让我坐在三屉桌前的方凳上。过了一会儿，戴着军帽、穿着军装的王文政，十分潇洒地走了进来。缅文翻译“红鼻头儿”等三人，对其毕恭毕敬，满面阿谀。王文政走到三屉桌后面，我也倒背着双手站起来——不是不服他，而是因为我的双手被铐在身后。他和蔼可亲地以手示意，让我坐下。等他在椅子上落座，我才重又坐在方凳上。

王文政笑咪咪地打量我一番，开口就问：“生活怎么样？”我说：“还行。比想象的好多了。”他说：“监狱毕竟是监狱，再好也不如单位！”我说：“那倒是。没法儿比。”他说：“当初你要是听我的劝，好好清理问题，竹筒倒豆子，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没说话，心里想：还腆着脸说呢！我今天这个熊样，就是被你他妈的“劝”出来的！

王文政不知道我在暗暗地骂他，继续亲切地说：“最近我们正在考虑，准备让你回来，放到革命群众中去，改造你的思想，净化你的灵魂。我们认为，这样做也许对你更有利，省得你在监狱里一天到晚地没事儿干，胡思乱想瞎琢磨。”我不禁喜上心头，说：“怎么安排，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是我们的事儿呢？”王文政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你么！你要是早就转变立场，改变态度，今天就不必讨论回来不回来的问题，而是当初让不让你进去的问题了！”

我没说话。他观察了我一会儿，又说：“咱们有言在先，回来可是回来，你可不能乱说乱动，不能跟我们捣蛋！也不能再挤牙膏了，要把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事情，都痛痛快快地抖落出来，轻装上阵，继续配合我们的工作”——“又来了不是！”我心里想，“去你妈的吧，你那套戏法不灵了！”就对他说：“还怎么配合？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王文政陡然收起笑容，很不高兴地说：“他们转告我了，这种话你重复多次了！什么叫超额完成任务？我们冤枉你了？”停了一下，见我没搭腔的意思，他接着说：“我们一直在苦口婆心地做你的转化工作，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挽救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影响不好，很不好……革命群众认为，你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待，你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别的不说，光是改造思想这一项，就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你说，是不是？”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没说话。王文政的态度缓和下来了，说：“当然喽！革命群众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对你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年轻人么，犯点儿错误不算什么，改了就好。有很多事情，需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你看得一无是处。你和那个民办革委会的恩恩怨怨，我们就没有算到你的账上么！你说说，我们什么时候批判过你的那些反革委会的言论？”

没有和这头“荷兰奶牛”打过交道的人，猛一听到这番话，很可能误认为他是我舅舅，多么的“推心置腹”，“用心良苦”！已经上过当的我，把这全当作猫给耗子吊孝、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心里琢磨：这老家伙满肚子花花肠子，说不定又在打什么鬼算盘呢！

果不其然！他见我没什么反应，好像突然想到似的，一副不经意的样子，问我：“方应旸，你还有印象吗？”我说：“当然有了，他是我的老师。”“那你说说，你的这位老师是怎么死的？”我说：“我也不太清楚。那一段时间，我做业务工作，经常出差，没有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详细情况不了解。听革委会说，方被关在牛棚里，早晨起床洗漱时，趁人不注意，从四楼男厕所窗户跳下去摔死了。”

王文政紧盯着问：“是这样吗？”我说：“我听说的，就是这样。”

“我听说的，就不是这样！”王文政说。

我说：“当时，军代表和革委会都把我当作控制使用对象，根本没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有人揭发，方是被人害死的。”说完，王文政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事后我想，这个时候顺着王文政的“竿”往上爬，肯定会把老家伙乐坏喽！当时，我却不识时务，反而说：“不可能！人命关天的事儿，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既然你不了解具体情况，怎么可以断然说人家胡说八道呢？”王文政问，继续死死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说：“那他们说，是怎么害死的？”

“这就得问你了！”他说。

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就没好气地说：“凭什么问我呀？我又没说是害死的！我怎么知道？”王文政的脸色逐渐由晴转阴，盯了我好一会儿，才说：“那你为什么就认为，不是害死的？”我说：“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吧，用公安局的话说，就是要有杀人动机吧！方胆小怕事，与世无争，不招灾不惹祸，没得罪人，谁害他呀！”王文政紧接着问：“你说，谁会害他？”我立刻顶了回去：“问我干什么？谁说是害死的，应该问谁！”“看起来，让你坐牢，没起作用！”王文政颇为遗憾地说，接着就一通敲锣边儿：“你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不赶快觉悟，还要豁出命来替别人包着！”

这个老王八蛋又想冒坏水儿，要把我牵扯进去——他的话，意思很明显，在他看来，我至少也是个知情人！我心想，要是知道革委会害方，我早就折腾革委会那帮小子了，还能等到现在！

我激动地说：“我替谁包着了？我替别人包着，那谁替我包着！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什么坏事儿都说是我干的！有的没的，都往我脑袋上扣！我还有心思替别人包着！谁值得我包着啊？”“革委会呀！”王文政紧接我的话茬说，“你替他们包着！”我盯着他的眼睛说：“笑话！他们把我整

到这种程度，我还替他们包着？你到中国建设打听打听，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这倒好，昨天说我反革委会，整我一顿，今天又说我替革委会包着，再整我一顿，这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王文政说：“是不是又想说，谁有权谁有理，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我说：“我没说，那是你说的！”“你别急么！”王文政露出一丝冷笑，“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革委会对你明批暗保，你对革委会讲哥们儿义气。你们是一条绳上拴俩蚂蚱！”我问王文政：“有这么明批暗保的吗？既然明明知道，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还这么整我，就不怕我咬他们一口？！”

“你现在咬他们，也不晚么！”王文政露出一脸坏笑，继续拱我的火。

“可惜呀！”我说，“除了过去提的那些意见，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我咬不着。”“怎么咬不着呢？”王文政说，“现在就揭发出来问题了！他们杀害方应旸！”老家伙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给我扣上“杀害李翻译”罪名的经过，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顿觉王文政又要故伎重演，不择手段地为人家罗织罪名。我倒不是想袒护革委会那帮人，主要是出于义愤，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没法咬！”我又补充说：“虽然我和他们势不两立，但是我对他们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认为，他们不会杀人。我要知道他们杀人，早就收拾他们了，等不到今天！”

“张仁杰、刘浩呢？”王文政说，“最初，也有许多人不相信他们会杀李翻译。对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事实摆在那儿，革命群众都知道，他们就是杀人凶手，他们还证明你也是杀人凶手。这，你怎么解释？”

我说：“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事实总会搞清楚。第一，我没杀人，第二，就凭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楞把我扯进去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相信，张仁杰、刘浩会杀人，当然也不会相信革委会杀人。”“照你这么说，是我们搞错了？冤枉他们了？”王文政瞪着我问。

“你们心里最清楚！”我说，“连我这个坐在牢房里的井底之蛙，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都没有相信，外面的人怎么看，更可想而知了。”“你现在还敢担保张仁杰、刘浩没杀人吗？”王文政厉声问。我平静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的？我担保他们没杀人！我已经白纸黑字打过保票了。”王文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随即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你保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自己。”

我有权为自己辩护。这一点，王文政似乎还能容忍。我居然狗胆包天，竟敢怀疑他们煞费苦心破获的“杀人案”，他显然有点儿怒火中烧。但是，他毕竟比我有涵养，强压怒火，又与“红鼻头”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平静地对我说：“我不跟你打嘴仗，把问题扯远了。咱们还是说说那个民办革委会。”我说：“没啥好说的。听你的。”我的本意是，听他发表高见。他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

以为我会像以前那样让他牵着鼻子走，“配合”他的工作，或许他原本就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便略显高兴地说：“那好！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相信革委会杀害方的说法。”我问：“理由呢？为什么杀他？”“夺权哪！”王文政说。“夺什么权？方有什么权？”我说，“他是个中层干部，管业务的，磨房里的驴，听喝，卖苦力。”

“你终于抓住要害了！”王文政把身子往前探了探，继续说，“革委会就是要夺方的业务权。”我突然觉得王文政非常无知，很令人恶心，就说：“那也叫权？革委会统揽全社，大权在握，管业务的在他们领导之下，听他们的指挥，革委会用不着抢那份苦差事！”

“这只是你的看法。我知道，你根本没把中国建设那点儿权放在眼里。外文局的权你也不想要。你不是对哥们儿说么，外文局你就瞧得起三个人，罗俊、刘琪（副总编、八十年代初访美不归，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新中国“叛逃西方级别最高的干部”）、李天海（名牌大学毕业，政工干部）。你看你有多狂！”

“那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胆识、见识。”我说，“罗俊是条汉子。刘琪和李天海有学问、有口才，动不动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谈古论今，令人着迷。这跟权不权的没关系。”“你是干大事的！”王文政不无嘲讽地说，“革委会就不同了。他们嫌方碍手碍脚，必欲除之而后快。”我说：“我不这么看。邢根发对我说过，他们只是要吓唬吓唬他，他要是不自杀，第二天就让他恢复工作了。这说明，他们没有害方的意思。我相信邢根发说的话。”

“你相信他的，谁相信你的？”王文政问。我说：“爱信不信。你们问到我，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要不，我还懒得说呢。”

王文政又往前探了探身子，问：“你没有什么想法？不想对我说点儿什么？”

我说：“说起他们整我，我还真恨不得咬他们几口，但是，说他们杀害方，我不信。”

“看样子，你不想回来了？”王文政再次抛出了那块“肉骨头”，引诱我。

我实打实地说：“想回来！谁愿意在那儿呆着！但是，我不能凭空污人清白。”王文政终于发怒了，“嚯”地站起来，恶狠狠地说：“清白？说得好听！你们是一丘之貉，一个更比一个黑！难怪都说你是茅房里的石头！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是得好好端正一下态度！”说完，拂袖而去。

“端正态度”，好像是他们的一句“暗语”、“行话”。王文政抬脚刚走，“红鼻头儿”等三人就凶神恶煞般围住我，吼道：“站起来！”“狗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咣当”一声，小方凳被他们踢出去好远。“说！怎么杀害方应旸的？”我说：“我没害他。”他们吼道：“革委会怎么害的？”我说：“不知道。”“咣！”

“噏！”腰眼儿上一边挨了一拳。王文政出门时，又进来两个人向我扑来。“他妈的！说不说？”“咔咔咔”，身后的手铐子被捏紧了。我说：“没啥可说的。”“王八蛋！叫你硬！让你看看，你硬，还是手铐子硬！”“咔咔咔”，手铐子继续往紧了捏。

有人使劲按我的脑袋：“低头认罪！混蛋！”其他人一通拳打脚踢。我使劲用头顶按我脑袋的人。他来了个顺手牵羊，把我拽倒在地，使我闹了个“狗抢屎”，接着，打手们又踢又踹。那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穿着冬装，否则，后果不堪想象。

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更无法保护头部，然而他们好像商量好了的，谁也没有向我的脑袋下家伙，着实令我“感动”。痛打了一阵后，他们又把我提起来，忙着拳打脚踢，忙着给手铐子“上弦”。我既没说话，也没喊叫，任凭他们忙活。

也闹不清打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王文政什么时候又坐到了三屉桌后面。打手们不打了，我晃晃悠悠地站着。王文政似笑非笑地说：“这回清醒了吧？想通了吧？咱们接着谈。”他对打手们说：“给他松一松。”有一个人在我身后松手铐。在这之前，我光顾着体会挨打的滋味儿了，并未觉得手疼。一松铐子不要紧，“唵”的一下，双手又胀又疼，火烧火燎的，就好像有人拿着十根烧红的通条，从手腕处在肉里捅我的十个手指头一样，汗顺着脑门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两个太阳穴“噏”“噏”地狂跳，好像要炸裂开来。朦胧中，我听王文政说：“让他坐下。”有人搬来小方凳，把我按坐在王文政对面。

我一落座，眼泪“哗”地就下来了。这是我自隔离审查以来，第一次哭，也是“八年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落泪。哭，并不是因为疼痛，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经过这次洗礼，我的思想“升华”了。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在这之前，我真的只是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某些言行，此时此刻，强守一、王文政的指鹿为马、恣意妄为，使我彻底地幡然悔悟。我心里那个气啊：狗屁无产阶级司令部，都他妈的一个屁味，还不是以整人为乐，肆无忌惮地编瞎话，搞逼供信！林副统帅“口无遮拦”，一语道破天机，直言不讳“政治无诚实可言”，王文政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还不如副统帅诚实，说一套做一套，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搞逼供信，又指责别人搞逼供信，而自己在暗地里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如果说编造李翻译被害案，是强守一、王文政“昧着良心”干的，那么，硬把我和中国建设革委会扯到一块，编造出个杀害方应旸的案子，他们就纯粹是丧尽天良了！我恨自己，当初为什么鬼迷心窍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运动吗？简直就是“玩命”运动！“害命”运动！高的、远的不说，就说低的、近的，正当壮年、才华横溢的方应旸，怀着一肚子委屈走上了黄泉路，

死不瞑目，民办革委会那帮混蛋，也很可能即将成为替罪羊！

我得感谢强守一和王文政，正是这两个自称“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伙，把我引上了坚决、彻底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歧途”！

王文政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看见我落泪，以为他的暴力发挥了作用，我的态度已经“端正”，就不无得意地微笑着问：“怎么样？现在，你还认为革委会没有杀害方吗？”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我不相信他们会杀害方。”

旁边有人插嘴：“他妈的！找揍！这小子是卤煮寒鸦，肉烂嘴不烂！”

王文政以手示意，让他们别说话，继续问我：“你就这么相信他们？”我强打精神，忍着剧痛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杀害方。当然了，方的死，他们也是有责任的。”

王文政又变脸了，严厉地问：“你敢给他们打保票？”我说：“我只是说，他们不会杀害方。别的我不知道。”“你不想再对我说点什么了？”王文政问。我说：“没啥可说的了。”王文政恶毒地说：“那你就等着为革委会殉葬吧！”他对“红鼻头儿”说：“送他回去。”

临出门时，我突然觉得“这么灰头土脸地回去，肯定会在监号里丢面儿”，就回头对王文政说：“请他们把我身上的灰土弄干净。”有一个打手说：“他妈的，都死到临头了，还穷讲究什么？”他推着我往外走，我使劲“打坠坡”，王文政发话了，对我的请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告诉那帮打手：“他说的对。帮他弄弄，别让他这个样子回去。”

回看守所途中，车里的气氛非常沉重。红鼻头缅甸文翻译根本不懂“幽默”。我十分“怀念”陈明曦在场时那样的“严肃”和“活跃”。我心里念叨着：陈兄，你干什么去了？要是你有你在，咱们又可以“贫”上几句了！

我被两个打手夹在中间，坐在小轿车后座上。车里没人说话，我的双手疼得钻心。我尽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点儿别的。想着想着，我的心情如释重负，感到一阵阵的“轻松”。这种“轻松”，完全来自发自内心的赎罪感。我为曾经参加了一段文化大革命而感到羞愧，感到懊悔。现在我得到了报应，以自己的血和泪，还清了在那段“革命”中欠的债，向所有被我整过、反对过的“走资派”、革命群众，也包括民办革委会的那帮人，道歉！从此，我谁也不欠了。

在筒道头上的队长办公室门口，“红鼻头儿”他们为我取下手铐，双臂却一时不能恢复到正常位置，仍然倒背着，走了一段路，才慢慢地“自然下垂”。我走进牢房，尽最大努力“挤”出一点笑容，然而肯定比哭还难看——同号们都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谁也没动窝，谁也没吱声。

我默默地坐到铺沿上，指尖一沾铺板，疼得我一哆嗦，屁股赶紧往前蹭了蹭，让双手悬空下垂。听老张在背后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啦？”我咬紧牙关说：“没

怎么。”小陈和小刘凑过来一看，都“哎呀”一声。小刘俯着身子，一边观察我的双手，一边发布“消息”，作“现场报道”：“还说没怎么的呢！手腕子卡出了两圈深深的紫黑印子，手背肿得像发面馒头，皮亮晶晶的，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又黑又紫……给你带紧铐了吧？”我默默地点点头。“单位干的吧？”小刘问。我又点点头。“我说呢！”小刘愤愤不平：“雷子绝不会这么干！拘留所、看守所、劳改队，大爷我常来常往，就没见过雷子这么惩罚犯人的。嘿！你们都过来瞧瞧，瞧瞧！这哪是人干的事儿！”

几个同号默默地围上来，一边看一边“啧啧”感叹。老张看完后，忧心忡忡地说：“孩子，你的事儿有那么严重么？要是有什么没说的，赶紧都招了吧，免得活受罪！”他轻轻捅捅我的左臂：“能动弹吗？”我摇摇头。小刘替我回答：“还用问吗？且得缓一阵儿呢！丫挺的，比雷子还狠！”“你有经验，”老张对小刘说，“想办法帮帮他。”小刘说：“没什么高招！只能按摩，还不能碰着手。”“那就别骂大街了！”老张说，“赶紧帮他弄吧！”

牢房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闷。说话的人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好像怕吓着谁似的。小刘细心地按摩我的双肩、双臂，不时问我：“疼吗？劲大了就言语一声。”按摩双肩和两个上臂，还不算太难受，按摩小臂时，双手就胀得厉害，疼得厉害。小刘说：“不要紧，忍着点儿，那是血冲的，好事儿，血脉畅通，才会好得快。”他对我，又像是对大家说：“估计紧铐儿的时间，怎么也得在四十分钟以上，捏的也太紧。丫挺的不懂规矩，胡来，要不就是故意整你，想废了你的手。”

小刘按摩了一阵儿，叫：“陈儿，过来，替一会儿，我累了。”小陈接手，小刘嘱咐他：“照我刚才那样，别太使劲，悠着点儿。”小陈按摩一阵，中厅那边传来了饭桶落地声。牢房里骚动起来。小刘一边洗手，一边吩咐：“陈儿，行了。歇会儿。看他胳膊能动不？估计差不多了。”我试了试，两个大臂能轻轻前后摆动，尽管很疼，小臂还不能动，觉得两只手沉甸甸的。小刘说：“这一阵儿的按摩特重要。要是没人管，就瞎迷了，两只手八成要歇菜！还是坐牢好吧，有人疼你！”

我的手臂不能弯曲。吃饭时，小陈把窝头掰成小块，一块一块地喂我。饭后，小陈和小刘又轮流为我按摩。听“新闻联播”前，手臂能弯曲了。我这才得以看清双手的惨相跟小刘的描述差不多。小刘说：“好多了，又黑又紫的地方，都开始变颜色了。”他吩咐道：“明天找两块布，把手吊在腰前，省得空得慌，上下午各按摩一次，能好得快点儿。”

“新闻联播”后，我向陈康伯“作了汇报”。他说：“你做得对。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即使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实事求是。”据陈康伯分析，所以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一是他们原本就好蛮干胡搞，也可能在这之前，在其他人身

试不爽，二是提审时，我总和人家辩论，还冷嘲热讽，激怒了“对手”，三是他们要拿那个革委会开刀了，想通过高压手段，在我身上捞些炮弹，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别以为你反革委会反对了，“你们是一丘之貉”。

陈康伯认为，“如果你对我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单位的运动搞得很不正常，有康生抢救运动的遗风。姓李的那个案件出现某些偏差，还可以说是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一而再，再而三，那就不仅仅是失误的问题了，而是有某种故意的成份”，“然而，究竟是因为‘好大喜功’、‘骑虎难下’，甚或还有其它别的因素使然，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妄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像是中央的意思——联络员，联络员，不比首长秘书，应该做一些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工作，也就相当于一个传声筒。插手具体工作，甚至越俎代庖，远远超出了职责范围，按组织纪律的要求，是不允许的。这个总理联络员值得怀疑。”

陈康伯所说“骑虎难下”，源于我说强守一扬言要抓六百名“五一六”，却成果甚微。

晚上睡觉，我只能平躺着。剧烈的疼痛，使我难以进入梦乡。但是，一想到革委会那帮老少爷们儿有可能在劫难逃，即将或已经成为强守一、王文政的盘中餐、口中肉，就有一种“快感”：以前，你们“专政”这个，“专政”那个，眼下自己也要被“专政”了，真是苍天有眼哪！不知道哪位老兄将要进来跟我“做伴儿”呢！最好，除了邢根发，全都来！这么一想，似乎手的疼痛就减轻了许多。

转念一想，文化大革命倒挺有意思的，简直就是撺掇中国人打“圈儿架”。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真正祸首。中央文革总是在一定阶段内，利用一个特定的人群，打击另一个人群，初期把红卫兵小将捧上了天，等到斗垮了“走资派”，就把他们一脚踢到乡下去了。鼓动老百姓冲击部队，“揪军内一小撮”，随手又让当兵的到地方上整老百姓。让造反派疯狂地收拾“一切旧社会的残渣余孽”，随后翻过手来又算造反派的账——《小兵张嘎》电影里有一句名言：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许多中国人本来就吃不饱，没有多大油水儿，再这样整来整去，社会还能和谐，“人民”还能“万岁”么？

第二天早饭后，我按老张的意思，“求医”，看看是否“伤筋动骨”。在队长办公室，大夫检查了我的双手、双臂，说：“神经、血管、肌腱，好像问题不是很大。主要问题是消肿。”他往我手背上涂碘酒。手背刚一沾碘酒，有如无数钢针刺肉，疼得我呲牙裂嘴，直哆嗦。我说：“不行，受不了，还不如不涂呢！”大夫说：“那就算了，吃点儿消炎药吧！”他又说：“按摩的效果不错，情况不算太糟。还是让他们帮你按摩吧！不过，要注意，别碰破皮肤，要防止感染。”

小陈和小刘每天为我按摩两次。一个多星期后，消肿了，手指能活动了，“吊

带”也不用了。其间，吃饭、解手，都靠小陈和小刘帮助。他们说，我胸前、后背，也青一块紫一块的。二十多天后，手指活动自如了，按摩也停止了。这之后，手背的皮肤就像覆在手上的一层厚厚的牛皮纸，与肉分离着，没什么感觉。后来，渐渐觉得那层牛皮纸越来越薄，有了明显的冷、热、痛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种“牛皮纸”的感觉，才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还有比我更惨的。时至今日，刘浩的手腕上还有戴手铐留下的淡淡的疤痕。一位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婿，曾经被强守一、王文政们誉为“陕北土皇帝的驸马”的马兄，少言寡语，老实巴交，在我眼中是个内向的人。他一向反对造反派动手动脚，坚决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却反复遭到强守一、王文政们“武斗”，在狱中，他长期戴手铐和二十八斤重的“钢球脚镣”，两个脚脖子磨得鲜血淋漓，而今手腕和脚腕仍然留有明显的印痕。

又一个“破案大会”看“表演”

1971年4月6日下午，阔别三个月后，“老相识”陈明曦等三人又来了，在队长办公室门口，把我双手铐在背后。陈明曦“严肃”地说：“今天开批斗会，老实点儿！”我说：“怎么？要公演三岔口了？”他说：“别胡说！什么三岔口？”

在汽车上，他说：“李闯，别瞎说！我们什么时候动过你一根毫毛？”我说：“你是够可以的，怕沾身上血，一遇武斗就躲了！”他似笑非笑地说：“去你的，别瞎猜！有那工夫好好考虑问题。”我说：“看起来，你们和军统差不多，分工明确，抓捕组，监管组，审讯组，行动组，各负其责。不过，有一点赶不上人家。他们实实在在地摆了一桌酒席，许云峰不买账，才改为全武行。王文政倒好，说是让我回外文局，只给我画了一张饼，接着就大打出手。”陈明曦佯怒：“再说，再说！不长记性！改不了你那臭毛病，这种事也是能乱比喻的？！”我旁边一个人对陈明曦说：“甭搭理他！整个儿一个滚刀肉！”我特别欣赏这个评语。

汽车奔了外文局东南不足两公里处的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我在这儿看过电影，今几个外文局要在这儿“拍电影”，不知道让我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党校内葬着外国传教士汤若望。早在清初，这位“上帝的使者”就跑到中国来传播“福音”，鼓吹“让世界充满爱”。他还帮助大清朝选择了一位“可持续发展”的皇帝——顺治皇帝死前，想让二儿子福全继位。任职于清廷钦天监的汤若望和孝庄太后，力保顺治的三儿子玄烨登极，这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不知道文革之后的一些中国人，是为了凑热闹，还是因为没啥可信的了，转而念汤若望的好，笃信“天主”了——每逢平安夜、圣诞节，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前总是人山人海，宣武门教堂也人满为患。我盼望“天主”显灵，可比这些人早，1971年4月6日那天下午，

就暗暗祈祷：“天主睁睁眼吧，好好看看强守一、王文政又要干什么坏事儿了！”

进党校大门左拐。路上人很多，汽车轻轻鸣笛，慢慢向前爬行。突然，我发现“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已经受到“宽大处理”的李扬，在他们阿拉伯文部的几名女将簇拥下，向党校礼堂走着。我心里琢磨：果然是“不予追究”了，已经交上了“桃花运”，躲在“花丛中”笑呢！汽车从他身旁慢慢驶过，我回头再看，好家伙！他那原本青春亮丽的“盘子”，又黑又瘦，愁云密布。我心里不禁一沉：“宽大处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呀！

汽车停在礼堂后门，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坐在与门斜对角的椅子上以后，陈明曦他们就都到室外去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记得门开在屋子临室外台阶那一侧的右角。屋子约有十几个平方，沿墙摆着一圈儿板条长靠背椅。不一会儿，陆续被押进来三四个人，其中就有路上见过的李扬。押解他们的男男女女也到室外去了。留在屋子里的人，个个神情沮丧，沉默不语。我怕给他们添麻烦，不敢盯着他们看，更不敢和他们说话。

又被押进来一个人，这不是齐老歪么？我心里暗吃一惊。他的个头约有一米八，还是那么“肥”，满不在乎的样子，坐在门边的位置上，眼睛“滴溜溜”不停地转，笑嘻嘻地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我很诧异：这个法文翻译，复员兵，是著名的“逍遥派”，根本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除了专心做业务工作，就骑着那辆捷克造的“加娃”摩托车，搞“姑娘追”，说话时总好歪着脖子，外号“齐老歪”。我与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是东北老乡，他谈恋爱时，我给予过一些物质支援，所以私人关系不错。他比我大两岁，以老大哥的腔调劝过我：“少跟着搅和！小家雀斗不过老家贼，你们搞不倒那帮老家伙……哪次运动不搞秋后算账？五七年大鸣大放，好多人都吃了大亏，成了右派。还是搞业务保险。你悠着点儿，别强出头！”我暗自琢磨：“强守一、王文政这是怎么了？莫不是成了疯狗胡乱咬人！怎么把齐老歪也揪出来凑数了？”

我打量着他，与他目光相对时，他可能看出了我眼睛里流露出的种种疑惑，就一通冲我挤眉弄眼作鬼脸，“频送秋波”。我暗想：“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想不到你这个胆小怕事的人还有如此的闲情逸趣！”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儿，怕给他增加罪状，不敢再看他了。

批斗会揭幕了。在这个屋子里，我第一个被押往前台。同1970年12月29日在展览馆剧场一样，我“轻松”地站在舞台前左侧。民办革委会的“管不了”，被两个大汉押着，已经“撮”在舞台右边，与我遥遥“作伴儿”。我心里一阵惊喜：老东西，你也有今天啊！我又暗暗地在心里对他说：“你张牙舞爪时，我与你针锋相对，你的落难，不仅与我毫无关系，而且我还因为替你辩解，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老东西，你好自为之吧！”

那是我第一次“心情愉悦”、“心安理得”地接受批斗——“同归于尽”，也不失为一种“打击报复”的方法！

主要发言人愤怒地数落了“管不了”等人残害革命干部方应旸的经过。我想，不管真假，如此一来，方老师的在天之灵，多少也能得到慰藉了。用这种方式寄托人们对他的哀思，对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哀荣！

接着，几名“凶手”先后上台，表演和上次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如出一辙，哭天抹泪，“认罪”、“忏悔”，虽然也有点我名的，但只说我是“参与者”，没说我是策划者。令我再一次感到震惊的是，齐老歪居然声泪俱下地“交待”了参与杀害方应旸的罪行！与他“候场”时的嘻皮笑脸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暗想。接着，我便恍然大悟：齐老歪知道今天来干什么，他在向我暗示，“别当真，逗他们玩呢！”什么“杀害李”，什么“残害方”？统统不过是强守一、王文政之流导演的闹剧、“丑剧”！展览馆剧场大会之后，我久久不能释怀的一点疑团，顿时烟消云散了！不过，我暗暗地埋怨那帮“演戏的哥们儿”，“玩儿什么不行？怎么非要玩这种《禁止的游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映的一部译制片）呢！”

批斗会开了大约一个小时。末了，“管不了”被逮捕，其他“凶手”照例当场开释。

回看守所的路上，车里的气氛分外活跃，甚至有点儿“喜气洋洋”。陈明曦“不怀好意”地问我：“怎么样？今天没白来吧？高兴不？”我也“不怀好意”地说：“那当然了！我和民办革委会的账，你们帮我结了！”陈明曦说：“所以我才主张，今天这个会，无论如何也应该让李闯参加！”我说：“算你又做了一件好事，给你记一颗红豆儿！”他说：“我们还是区别对待的！没把你怎么样吧？”我说：“应该的！王文政心里应该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陈明曦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绝不食言。说不让你撅着，就从来不让你像其他人那样撅着、坐飞机，说不向你提问题，就一直没让你当众回答问题。”我说：“谢了。我喜欢和你这样的人配合。王文政较你差远了。”我旁边的人说：“你小子好了疮疤忘了疼，见空就钻，都什么时候了，还拉一个打一个！”

打这以后，好长时间也没见到外文局的人。

林彪事件后的两次提审

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文政，是林彪摔死以后的1972年春天，真真切切的乍暖还寒，全国正在批判“极左”。

一天上午，陈明曦等两个人，把我从牢房里提出来，带到看守所大铁门对过

的红砖办公楼一楼的一间办公室。王文政戴着军帽，穿着军装，背对着窗户，稍稍半侧着身子，坐在一张淡黄色的三屉桌后面。

我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小方凳上，陈明曦等三人在我和王文政侧面站着。和一年前相比，王文政显老了，面色阴沉，如丧考妣。从窗子射进来的阳光，直晃我的眼睛。不到十五个平方的屋子里，暖融融的。王文政的脸，半明半暗，心情估计也是这个样子。

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我没有流露出来。要是王文政不在场，我和陈明曦说不定会“畅谈”一番。

王文政不拿正眼看我。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准备不充分，有点儿没话找话的样子，似乎“很随便”地问：“每天都做些什么？”这显然是明知故问。“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我答。他又问：“都学习什么？”我答：“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就这些？”他问。我答：“就这些。”他想了想，接着问：“看了报纸，有什么感想？”我狡滑地回答：“还能有什么感想？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没有联系思想实际？”他问。我已经领会到他的意思了——很想让我就“批林”、“批极左”发一通议论，但是我没有顺着他“铺的道儿”走。

我没什么水平，当初只是常常与一些人瞎议论，仅仅觉得文化大革命搞过火了，“极左”，觉得林彪的健康状况不如伟大领袖，不该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写明林彪当接班人……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这么个死法！当然，不管怎样，我的罪过因此减轻了。出水才看两腿泥，不管党中央如何费尽心机地解释“早就洞察了林彪心怀叵测”，副统帅的这个死法，还是让伟大领袖和党中央被动了。我认为，我们哥儿几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说了那么几句牢骚话，不值得一提。当初他们不该因此整我，今天我也不必自以为“先知先觉”，再说，自打王文政把我牵扯进两桩“杀人案”之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不想再跟他费口舌，然而又不能不理他。因此，我给了他一个“软钉子”，在他问我“没有联系思想实际”以后，我对他说：“您说过，改造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他可能也没想到，在他审讯我时，我这个惯于信口开河、“问一答十”并和他辩论的人，今天会这么“守口如瓶”。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瞄了我一眼，才说：“不是我说，实际情况如此。”又是一阵沉默，他好像再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题了，便问：“有什么要求没有？可以对我说，能办到的，就给你办。”我想应该乘机捞他一把，就说：“我带的钱不多，希望能给我点儿钱。”他问：“需要多少？”我没好意思“狮子大张口”，于是说：“有五十块就行了。”他说：“好吧，我让他们办。”

“谈话”也就进行了十来分钟，便结束了。在这之前，我要过几次钱和衣被，他们都没给，这回“谈话”之后，单位还真就往我的“账户”里打了一百块钱，到出狱时也没花完。

我庆幸自己经过“历练”，多少也“成熟”了一点儿，和王文政谈话时，没有“联系实际”，谈“学习收获”，谈“思想改造”。我要是大发议论，又得吃不了兜着走——当时，清查“五一六”运动，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又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反反复复地拉大网，梳篦子，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有逼供信情况。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清查“五一六”运动受到一定震动，有消息说，1974年，“五一六黑后台”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就“解放了”，后来报载他们还光荣地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林彪折戟沉沙后，抓“五一六”的事儿，实际上也就在短时间内停顿了一下。然而风向很快就变了，从批“极左”，改为批“形左而实右”。强守一、王文政一好受了，就想让我难受。他们可能认为，我知道自己是“羁押”，不是“逮捕”，林彪完蛋了，“极左”也批过了，我的压力减轻，会闹翻案。于是，他们又导演了一个“小品”。

197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队长把我叫出牢房，打破常规、异乎寻常地说了一句对任何被提审的人都从来没说过的话：“提审。”我远远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等在队长办公室门口，穿着一身深灰色干部服，没带帽子。走近再看，不认识，个子比我足足高出一头。如前所述，刑讯逼供时，王文政就会弄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当打手。我一见这个陌生的大块儿头，就做好了挨揍的思想准备。奇怪的是，那个人没给我戴铐子，这说明提审将在看守所内进行。我多少有些踏实了——在这个地方，那帮小子不敢太放肆。

他用不大不小的男中音说：“走！”他跟在我后面，我按他的指令，奔向K字楼南面的预审楼，上二楼，进了一间朝南的屋子。和陈明曦在预审楼提审我一样，屋子里文件柜、办公桌，审讯台等，一应俱全。他让我坐在门边的方凳上，自己径直走到审讯台后面，站着。阳光从南窗射进来，他的“剪影”显得分外的高大、庄严。他不温不火地问：“最近，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该说的都说了，没新鲜的了。”我想再加上一句“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转念一想，“咱跟人家不认识，说这个干嘛？”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

他说：“没那么简单吧？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待的。”我说：“真的没有了。就等着处理了。”他反问：“没有了？等着处理了？有那么轻松吗？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交待。”我暗想：你们都是这一套，没什么新鲜的！要不借口“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待”，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可不都得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么！

见我说话，他问：“苏开明你认识吗？”我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说：“不可能！苏开明说了，你跟他有联系！”——露馅儿了吧！

苏开明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英文翻译，六十来岁，满头银发，脾气特倔，我们年轻人都管他叫“苏白毛”。他旅居海外多年，又带着外国老伴儿回国工作。我和苏开明之间，“隔行如隔山”，别说“过话了”，见面连头都不点。1967年年中，他因为反民办革委会，而且“非常嚣张”，被扣上“间谍”帽子。民办革委会用解放牌大卡车将其“扭送”到皮库胡同的西城公安分局，在外文局首开记录，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坐牢的“先行者”，我的“老前辈”。那时候我多“革命”啊！怎么能跟他有“联系”呢！

他说完“与苏开明有联系”这句话后，我根本没作任何解释，懒得费那个口舌！

他看了我几秒钟，转身走到南窗前西墙下的文件柜前，开锁，打开文件柜门，取出一个厚厚的卷宗翻了几下——这一系列的动作，无非在暗示，他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货真价实的预审员。

他拿着卷宗走到审讯台后，站着继续翻看，有意无意地向我展示了卷宗上写着的苏开明的大名——这无非是想表明，他的确是负责苏开明一案的人。强守一、王文政无非是想通过这一招，让我相信，我的案子已经由公安局接管，逮捕了，我现在是“公安局的人”。

我竭力紧紧地绷住脸，免得不小心露出嘲弄的笑容，暗想：哥们儿，甭看了！在那里要是能找到我的“问题”，用同号小刘的话，我“把眼珠子抠出来送给你当泡儿踩！”

他假模假式地看了一会儿“材料”，合上卷宗，问我：“有什么要交待的吗？”我说：“没有。”

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聊”下去，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也可能觉得“心理战”已经达到目的，取得了“应有的成效”，也无话可说了，也就用了七八分钟的时间，他就把我送回了牢房。

我当时猜测，这位预审员办苏开明的案子，免不了常到外文局“调查研究”，一来二去，与强守一、王文政们混了个“半熟脸儿”，于是，强、王们就“有这么一件小事儿”，请人家“帮个忙”，“如此这般”地给我点儿“颜色”瞧瞧。人家不好推诿，又不好假戏真做，只好自始至终站立着“应付”一下。

其实，强守一、王文政枉费心机，多此一举。我从来就没把羁押还是逮捕当回事儿。初到“寄宿学校”，我已经领教了老张的宽厚、老白的油滑、陈康伯的老谋深算，也学到了小刘的“现实主义”。在小刘看来，什么政治犯、刑事犯，什么逮捕、羁押，“都他妈的一样”，不分等级，待遇相同。至于将来的“出路”，

我更看得开。别看张仁杰、“管不了”被轰轰烈烈地扣上了“杀人犯”帽子，革命群众“杀声震天”，问题却很好解决！强守一、王文政变的那些戏法，到了公安局的行家手里，会让人家看作“小儿科”，嗤之以鼻。你想啊，连我这个外行都认为他们不论杀人动机还是给“杀人犯”设计的作案地点，完全自相矛盾，对杀人犯的处理又像同号小刘的一句口头禅“狗彘猪——稀里糊涂”，公安局会当真？强守一、王文政这两个蹩脚的“编剧”搞出来的“故事”，一旦不攻自破，作为“老干部”的张仁杰和“管不了”，立马儿就会“回家抱孩子去”！

事实的确如此。后来，负责“复查”外文局一系列“案件”的公安部的同志，和外文局保卫处干部陈忠原告诉我，强守一和王文政一共“编”了四起“谋杀案”，三次报送公安部，均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他们怕被革命群众识破真相，就多次在外文局“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讨论”，造声势，给“杀人犯”们量刑、判刑，再以“革命群众的要求”为名向上报。最初几次，革命群众坚决要求将“杀人犯中的六名主谋”判处死刑，最后两次“宽大为怀”，分别改为“要求将三名主谋”和“两名主谋”判处死刑……无论是“六名”，还是“三名”、“两名”，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恶毒攻击”、“顽固透顶”而均榜上有名。

我之所以能踏踏实实地坐牢，“丢掉幻想”，主要是因为心里明白，我只不过是一只小虾米，问题又比张仁杰、“管不了”他们“麻烦”。咱那点儿事儿，如同同号小刘所说，属橡皮筋的，说长就长，说短就短，得“等待时机”。可是，天知道这个“时机”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狱中得知的外文局“灾情”

自1972年秋天演出了那个“小品”之后，秋去冬来，春去夏至，我在监狱里足足干等了四年半的时间，居然无人理睬！无人过问！

现代人都图个“吉利”，极为看重“六”和“八”，以为“大顺”和“大发”。想想我的经历，“六”和“八”就毫无喜庆可言——1970年3月8日，我被隔离审查，1970年11月6日，我进了监狱，1971年1月6日，我被批斗，1971年4月6日，我被扣上了“杀害方”的罪名……

“山不转水转”，别看牢房狭小，与世隔绝，1976年以后，我居然见到了几位“乡亲”，以及熟悉外文局情况的人，逐渐地听到了一些“乡音”，获得了一些“乡情”。

小邢是1977年初来到我们监号的一位小玩闹，二十五岁，中等个子，瓜子脸，人长得倍儿精神。此前四年多以来，我在这个牢房东铺中间位置没动窝儿，人家小邢却先后沿着派出所——拘留所——劳教场的线路绕了一大圈儿之后，又来到

了市局看守所“寄宿”，“一路上”他处处遇到外文局的人，常常在我面前以“半个老乡”自居。

劳动教养期间，他与“李闯反革命小集团要犯”刘××在一个队里呆了一年多，刘是他的“学习号”。

这一次“重游故里”，他先到了炮局，在那里碰到了外文局的眼镜陈（当年把我从部队招收到外文局的那位干部）。转到市局看守所以后，在我们这个筒道里，与中国建设杂志社邢根发关在一个监号。都是“本家”，性格相近，因此二邢的关系处得不错。

小邢调到我们的监号后，听说我也是外文局的，自然“亲得不得了”，无话不说。用小邢的话说，“这叫缘分！”“到哪儿都得服从外文局的领导！”

1970年11月6日，在外文局于建工礼堂举行的逮捕我的大会上，刘××受到宽大处理，继续做他的英文翻译工作。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守身如玉”。我一而再地被强守一、王文政塞入“谋杀案”中，他并未受到牵连。

有些“杀人犯”，当初一个个演戏般地登台“认罪”、“揭发”，有“诱导出供”的，也有“屈打成招”的。强守一、王文政先“冥思苦想”设计一个“案子”，然后“重点突破”，选择胆小怕事的，对其软硬兼施，百般启发，迫使其和他们合作，共同编出一套故事情节，形成交待材料，再一个个地攻坚，逼迫那些“死硬分子”就范，如果不照着他们指出的道儿走，就三番五次地“端正态度”，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要是在大会上喊冤叫屈，就用烂抹布、臭袜子堵上嘴……强守一、王文政的编导手法太拙劣，破绽百出，同一个“案子”的“杀人犯”所说的杀人手法、作案地点和经过，都对不上茬儿。细心的革命群众经常用大字报揭“剧情”的短儿，提出质疑。有一次开批斗刘浩的大会，一个哥们儿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刘介绍他参加“五一六”，以及一块策划杀人的罪行，跟真事儿似的，革命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刘不耐烦地对那个哥们儿说：“差不多就行了，别装了！我知道你会演戏。”那个哥们儿竟然当众破涕为笑，把戏给演砸了。

一名“杀人犯”被关押在一个套间里。监管他的一个有妇之夫和一个有夫之妇，乘革命群众集体看电影之机，居然在套间外屋演床上戏，被里屋的“杀人犯”撞见了。“杀人犯”向王文政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坚决拒绝这对狗男女”对他隔离审查。那个有妇之夫的妇，就在强守一、王文政“身边”工作，形同机要秘书。军管小组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终于“从谏如流”，接受了“杀人犯”的要求，来了个走马换将。这件花事儿，一度闹得“满局风雨”。

王二（王宗林）、李×这两个“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虽说受到有限的宽大处理，又一再被诬为“杀人犯”，都一直耿耿于怀，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时，

牢骚满腹，怪话连篇。“他们搞不下去了，没法定案。”这是王二的口头语。他被隔离审查56个星期，居然扬言让军管小组“赔”他56个星期天。军管小组勒令他写揭发材料，他一再拒绝，说什么：“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

李×“张牙舞爪，咄咄逼人”，动不动就站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关、管、杀，随你们的便！我豁出去了！”夏收时，这位老兄一边磨镰刀一边对监管他的“革命群众”说：“都躲远点儿！别看以前没杀过人，现在没准儿就要杀一个！”

外文局遵照最高指示，最初把五七干校设在江西，不久搬到河南，最后扎根在河北固安。革命群众分期分批到干校“锻炼”，有些人轮了两三次，江西、河南、河北都呆过，而军代表数次让“杀人犯”小于“下干校”，他都拒绝：“不解决问题，不还我清白，我就哪儿也不去！”结果小于一直在北京“漂”着。

到1971年下半年，留在局里的“杀人犯”们刮起了一阵“翻案风”，纷纷大呼冤枉。刘××虽然没有卷入“谋杀案”，也乘这股“翻案风”喊冤叫屈。

强守一、王文政眼看“戏法”将被拆穿，便狗急跳墙，把那些喊冤叫屈的“杀人犯”，一个个投入了监狱。听小邢讲的那个意思，北京市各区县，以及市里的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劳改队里，几乎都有外文局的人，而我们所在的这个筒道里的每个监号，都“安插”了一个，“也许因为北京太小，装不下外文局的人”，河南省“五一”、“五二”监狱里，也有外文局的“房客”。

我入狱半年后，以前拼命抓“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的革委会成员，被一锅端，都成了“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管不了”先进了监狱。其他成员由于参与刮“翻案风”，也陆续吃上了囚粮。“咋呼”被关在延庆，陈委员被送进自新路的一监。最逗的是，曾经说要吓唬吓唬方、劝我“小心点儿”的邢根发，被稀里糊涂地送到秦城监狱住单间儿，吃每月三十多块钱的伙食，还可以在阳光灿烂的小院里独自散步。警卫战士觉得他“面相太嫩”，不像“大干部”，偶然间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邢说：“我是外文局的翻译。”警卫战士感到奇怪，说：“翻译？翻译怎么会到这儿来？！”就这么一句话，邢兄的幸福生活很快便结束了，被转送到半步桥看守所来了。

刘××想“翻案”，但不是“杀人犯”，受到“区别对待”，在良乡“集训”了几天，被送到设在唐山地区的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作为学习号，与“弟兄们”友好相处，工作做得不错。队长们对他很满意，不仅常常安慰他，鼓励他学好外语，还予以格外照顾，破例允许他看英文书籍、“写写划划”。因表现突出，提前“解除劳教”，回原单位工作。

在刘××劳教期间，他妻子差不多每个月都带着三四岁的儿子，从外文局到茶淀去看望丈夫一次，送吃送喝，送英文书籍。回到外文局，她就东奔西跑，忙着上访告状，为丈夫伸冤。据说，一个大冬天，为了见到中央某部一位“首长”，

她居然带着年幼的儿子，在某中央机关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坐了整整一宿。

还有郝女士和白女士也在拼命地为洗刷自己丈夫的“罪名”，奔走呼号。尽管她俩证明，强守一、王文政说她俩丈夫“杀人的那个晚上”，一家老小都厮守在一起，言之凿凿，无可辩驳，她俩的丈夫还是坐牢六年多。刘妻子、郝女士和白女士的行动，得到一批正义之士的大力支持，“告状信”、“申述材料”堆起来，足有一人高。她们比我这个坐牢的人吃的苦、遭的罪、受到的“白眼”，要多得多。后来，据公安部复查组的同志和外文局保卫处的陈忠原同志透露，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之所以重视外文局的一系列“案子”，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立即向外文局派遣了调查组予以复查，与她们和一批正义之士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密不可分。因此，我对这三位女士和那些正义人士，一直心存敬意和感激！

小邢与老邢同在一个监号时，遇到的事儿更新鲜。1967年邢根发他们把“反革委会”且“里通外国”的苏白毛（苏开明），扭送到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邢根发于1971年从秦城监狱移至市局看守所，进监号里一看，真是冤家路窄，苏开明竟然稳稳当当地坐在铺位上，而且斗志不减当年！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一老一小经常在监号里打嘴架。苏开明“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不时愤怒批判民办革委会。邢根发虽然成了落汤鸡，仍然“瘦驴拉硬屎”，针锋相对地声讨苏开明“里通外国的罪行”。当然，只要苏开明一说：“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邢根发就多少显得有点儿气馁。“是啊！”邢根发不禁悄悄对小邢大发感慨：“阿拉（上海方言：我）也勿晓得，怎么就会走到了这一步”，“本来是一心一意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中央文革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万万想不到，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强守一、王文政居然照我们革委会头上下家伙，把我和这个老白毛弄到一块来了！”据小邢说，有的政治犯挖苦邢根发：“我看你是热昏了头，分不清东南西北，拍马屁拍到马蹄儿上了！”大多数同号看这一老一小鸡吵鹅斗的热闹，感觉“外文局真够烂乎的”。

苏开明比我出狱早，不久因病去世。

家住甘家口的小陈，二十三岁，细高挑，很文静的一个人。作为外文局的“街坊”，他对外文局的情况可谓“门儿清”。根据他的叙述，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大概齐的印象，外文局近几年输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许多年轻人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外文印刷厂的工人和“工农兵大学生”。这令我产生一种“沧桑巨变”、“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慨。小陈说，中国建设杂志社有一位年轻的英文翻译，“工农兵大学生”，在甘家口一带的小玩闹中“戳一份”，号称“老三”。因为有这么层关系，小陈对外文局有一种“亲切感”，把外文局的事儿看作“自个儿家里的事儿”。他说：“外文局可算出了名了！”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在隔离审查期间跑了，爬上花园村水利水电学院内的一个大烟囱，

非要“讨个说法”。附近的居民都跑去看热闹，人山人海的。“我们哥儿几个也去了。那年头没什么好戏看，看爬大烟囱的，算是看一场难得的好戏！”那个人在大烟囱上呜哩哇啦地发表演说，由于烟囱太高，离得又远，听不清楚。“观众们议论，有人解释说，他说他是好人，遭到军管小组的迫害，不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就不下来……外文局的人忙坏了，想上去人，把他弄下来，又担心发生冲突，“同归于尽”，不上去人吧，他又死活不肯下来。僵持了好几个小时，那个人被弄下来了，脸都冻青了。还有一个年轻的被隔离审查者，也跑了。“他比较精”，小陈说，“不往大烟囱上爬，要往国外跑。”外文局“发了通缉令”。据说那个人被抓住之后，作“遣返原籍”处理（获得平反后，爬烟囱的大老爷们儿，自愿调回原籍工作，没爬烟囱的小老爷们儿自愿从老家返回外文局）。

听了小陈的讲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杀人犯”们，原来不光有哭哭啼啼“演戏”的，像王二、李×那样采取各种办法作“艰苦卓绝”斗争的也为数不少。

小陈说，前几年有几位在外文局工作的缅甸归侨，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有人猜测，他们也被强守一、王文政投入了监狱了。最近才听说，他们都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当了师长、团长、政委或政治部主任……

我从小陈口中还得到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方应旸被“谋杀”的案子搞得很大。不但“革委会”成员都是“杀人犯”，而且同方一起住在“牛棚”里的鲁平以及几个我不大熟悉的“老家伙”，也都是“凶手”——“证据”就是，他们坚持证明，方确实是自杀身亡的，其中一位“老家伙”乃是“学法律出身”，动不动就把军代表说得哑口无言，因而“虽为凶手，却没被当作凶手对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中几位“牛鬼蛇神”，一看苗头不对，便“反戈一击”，写材料证明方是被杀的，立即获得“解放”，成了“革命群众”。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已获得“解放”，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政治工作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是从外文印刷厂调过来的。艾培夫妇早已出狱，继续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干老本行儿。邱茉莉曾一度多了一份儿差事，教授杂志社员工英语。至此，社里人才知道，艾培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一直未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现在，老艾每月按工资比例交纳的党费，有一两千元之多。这两口子似乎对坐牢的事看得很开，没听说有什么怨言。我出狱后发现，还不仅如此，艾培的“政治观点”，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要“激进”一些，言者称：“他已经把自己融入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坚信这个事业是完美无缺的。”

偶尔“调号”，从别的监号来到我们监号里的在押人员一聊天，逐渐得知，我们这个筒道里别的监号里的外文局的人，有几个人早在几年前就被“提拔”为所在监号的学习号了。外文局真是“人才辈出”啊！从这些人说的情况可知，外

文局有二十多个人进了监狱。应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却因此而“信心倍增”了——涉及的人越多，问题就越好解决！

然而，同号们讲述的张志新的故事，令我毛骨悚然，惴惴不安，联想到在狱中仅见的两名“五一六”嫌疑分子，来自化工部的那位被打成“两个脑袋”，来自七机部的那位被打成了“拐子”，我觉得，王文政对我，对“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这些“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分子”，还算是客气的。他只是把我的“全身筋骨松了一松”，无论如何，我总算全头全尾地活下来了，拣了一条命！

公安部的复查提审

自前述苏开明老先生的预审员1972年对我的那次“提审”，到1977年春天，已经四年半没有人理我了。眼瞧着政治犯一个一个地“往外走”，我真的有点着急了！

直觉告诉我，“四人帮”垮台和林彪折戟沉沙的影响，程度不大一样。如果说“九一三事件”后，形势还不大明朗的话，那么“三公一母”的覆灭，则表明“大局已定”。从1976年4月的悲愤抗争，到10月的欢天喜地，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折腾了十年有余，全国人民总该明白了，也的确“累”了，纵然坎坷难以避免，恐怕趋势也不可逆转了。我认为，解决自己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盼星星盼月亮，到1977年仲春，总算有人理我了！

就在队长“解放”我身边的小于、并说“你们的学习号就可能有一个好的出路”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我被队长叫出牢房，看见筒道头上站着两个人，立刻意识到：不是队长找我谈话，而是要过堂了。走近再看，一胖一瘦，一老一少，哪个我也不认识。

他俩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带到预审楼里的一间办公室。我仍然坐在门边的方凳上。审讯台后面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位矮矮胖胖的，有五十多岁。带我来的两人分坐其两侧。左边那位高高胖胖，有四十多岁。右边那位三十出头，不胖不瘦，留着“小平头”。

我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对面那“老中青”的一举一动，“脑筋急转弯儿”，判断“来者何人”，“想干什么”，“会不会再来一次假提审”……

中间那位老者操着东北口音发话了，问“姓名”、“年龄”等“常规问题”，然后说，他和“小平头”是公安部的，另一位是外文局保卫处的。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立即作了指示，责成公安部组织调查组，复查外文局的“一系列案件”，“我们进驻外文局近半年了，所有涉案人员都接触过了，你是最后一名。

不妨告诉你，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我们调阅了全部案卷，包括上访信、申诉信，也看了你写的有关谋杀案的全部交待材料。无论你写了几遍，都前后一致，没有差别。今天，我们想知道，对于过去的交待，你有什么变动，或者补充？”

他们开宗明义，要了解“谋杀案”，不谈我的“言论”问题，我当然感到非常失望。转念一想，既然有人“管”了，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饭得一口一口地吃，甭管人家先从哪道菜下嘴！”我说：“没有变动，也没有补充。如果再写，还是那些东西。”

老者问：“那么，你有什么想法？”我答：“想法？杀人的罪名，是他们强加到我头上的，全都是无中生有，我一直未承认过，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他说：“要是这个意思，就不必再表达了。你不是还为别人写过担保书吗？”我大吃一惊，问：“你们怎么知道？”老者不慌不忙地答：“在你的交待材料里看到的。”我大惑不解，说：“这玩意儿也算交待材料？”紧接着，我说：“写过。那是话赶话，被他们逼的。他们说，你保证这个没杀人，那个也没杀人，你敢写下来吗？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我就写了一份张仁杰、刘浩他们没有杀人的担保书。”“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问。我答：“就李翻译、方应旸来说，我现在仍然认为不是他杀，至少不是强守一、王文政他们说的那些人杀的。”老者同左右的人交换了一下神色，谁都不说话。

我感觉，也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老者就让其左右两边的那两位把我送回牢房了。我还挺满足：虽然时间短点，却没给我“留作业”，再写那些“豆腐账”。

后来我才知道，“老”的叫刘发，腿有点跛，哈尔滨人，老八路，公安部的一位局长，文革中也遭过罪——连公安部长李震都不明不白地死了，他吃的苦肯定“够一梦”！“中”的叫陈忠原，从外文印刷厂调到局保卫处的，一张白白胖胖的“菩萨脸”。“青”的“小平头”，我把姓名给忘记了。我认为，现在由保卫处出面，而不是由过去的“专案组”出面，说明“各项工作都走上了正轨”。陈忠原是个大好人。公安部调查组复查期间，他一直陪他们审我，很少说话。我出狱后，他为我的事儿跑前跑后，出了大力：帮我重新安家，把我妻子、孩子调回北京，落户口，安置工作，上学，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根本没用我说话，也没让我“伸手”。

一别就是三个月。等他们三个人再审我时，已经是盛夏了。这次仍在预审楼里过堂，多余的话没有，旁事概不涉及，反反复复地让我谈1968年8月22日夜里都干什么了，在哪儿睡的觉，和谁睡一个房间，旁边的房间里睡着什么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谈”，甚至“要把每分钟的活动，尤其是细节谈清楚”。这些破事儿，我都说了、写了好几遍，他们还让我“再好好想想，仔细想想，仔细谈谈”，我有点不耐烦了，就说：“没啥可想的了，也没啥可说的了。当天晚上，我就是

和于××、田××同睡一室，在专家楼四楼上的宿舍。过去的交待材料，就这件事已经写好几遍了。既然材料在你们手中，你们看材料好了。”

看我那副“德性”，“老”的刘发和“中”的陈忠原倒没有任何表示，“青”的“小平头”勃然大怒，“腾”地站起来，拍桌子，瞪眼睛，喝斥道：“要是相信你写的材料，就用不着再问你了。既然问你，就说明你写的材料不真实！你还不耐烦了！告诉你，这是对你负责！让你想，你就得想……”

经过多年的磨炼，我已经学会了“装死躺下”，没跟他针锋相对。我侧过脸去，根本不看他，心想：“少来这套！吓唬谁？比你厉害的，咱也见过！不真实？不真实又怎么样？要是就我一个，不好说，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可是，李翻译的案子涉及许多人，我就不信，光凭那天晚上睡在哪儿这一件事，就定我个杀人罪！”

“小平头”的火气发泄完了，刘发平静而又带点揶揄地说：“这回明白了？瞧你这个劲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儿的！让你好好想想，是为了实事求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说来说去，还是为你好！你说你没有杀人，那你总得说出个名堂来，证明你不在现场。连那天晚上睡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你都讲不清楚，我们怎么相信你没有杀人呢？”

我转过脸，对着刘发说：“我已经讲清楚了。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你们可以调查核实么！”

“小平头”又蹿起来了：“用你说？我们当然要调查！也不瞧瞧自己的身份！还要对我们指手划脚！”我又侧过脸去，不看他们，心里琢磨：“都说俺们那疙瘩的人，是‘东北虎’，这个小北京比刘发凶多了，简直赛过金钱豹！”

这次过堂，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后，刘发让我：“回去继续想，别的事儿都放到一边，就想二十二号晚上的事！”但是，他们没有让我写材料。

大约过了十来天，他们三个人又来专门追查1968年8月22日夜里的情况。像上次一样，有“和风细雨”，也有“雷霆万钧”。最后，“小平头”说：“你说的那两个人，都说没有和你睡在一个房间里，你怎么解释？”我说：“我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说的是实话。”“小平头”“腾”地站起来冲我吼道：“就你记忆力强？就你说实话？人家都不行，说的都是假话！一个人说假话，两个人说假话，难道那么多人说的都是假话！都记错了？”我瞟了他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您说着了，真有这种情况！当初，好多人哭哭啼啼地上台认罪。他们都说了假话。”“小平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恶狠狠地把自己的屁股撂到椅子上了。

刘发心平气和地说：“别说别人，你还得继续想！不要自以为是！”我说：“不用再想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那样的——总不能因为一个晚上的情况对不上茬儿，就说我杀人了吧。”

这次过堂，又“不欢而散”。

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他们又来追查一次。我仍然固执己见，他们仍然很不满意，但是气氛比较缓和。直到一年多以后，我出狱的那天，刘发才告诉我：“你记错了！那天晚上，你和王二、刘××睡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旁边房间的人，也证明了这一点。”

几次提审，都纠缠与李翻译有关的事儿，关于“谋杀”方应旻那档子事，他们一直只字未提——我认为，“内行”就是“内行”，比起说我谋杀李翻译的事儿，说我谋杀方，在他们心目中，可能连“儿戏”都不如。

改吃“营养餐”与最后的调查

1977年9月的一天上午，值班队长打开牢门，让我：“收拾东西，出来。”几次过堂，双方总是“尿不到一壶”，“反动言论”的事儿还只字未提，因此我并未想到要离开看守所，除分给身边的小于一些日用品外，把所有“私人财产”全部带出了我呆了整整五年的这间牢房。临出门时，我转身与画家四目相对，和他点头告别。

我按照走在后面的队长的口令，下到K字楼一楼，出北门，奔那座红砖办公楼东侧，途经在单身牢房时放风的风场，向东拐，走入一个没有大门的院落，进了一座灰砖二层楼，到了二楼。乘两位队长交接的工夫，我扫视了一下环境，确认这就是同号们早就说过的“王八楼”。

我被关在东边筒道最东头一间朝南的牢房里，室内那叫个“阳光灿烂”，我不得不眯缝着眼睛。这间牢房约有两个单身牢房那么大，相当于K字楼集体监号的三分之一。房高不到三米，墙壁雪白。地铺对着门，与K字楼的一样，铺下可放物品。地面约有两个来平方，墙角放着一只塑料尿桶。窗户宽大，深红色窗框，上下两扇掀盖儿式玻璃窗上，涂着白漆。上面那层玻璃窗掀开，不必故意扒窗户，稍稍靠近，便能观看外面的“山景”：距楼约二十米开外，有一道砖墙，墙南有一大片空地，地下有大菜窖，空地南边有一排较高的平房。如果是顺风。能从平房那边飘过来饭菜香味和药味。出入平房的，有人穿着白大褂，有人系着围裙。同号说，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伙房和医务室。

监号里原有两个人，都在三十岁上下。无所谓学习号不学习号，当然也就无需集体学习和讨论。空地面积小，想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只能在床上进行。夜晚躺在床上，就显得宽敞多了，三个人谁也挨不着谁。其它诸如放风、放茅、洗漱、洗衣、打饭等等，规矩和K字楼一样。

也就中午十一点多，没听到饭桶在中厅落地的声音，我们牢房的那道包着铁

皮的木头门就打开了，一位头发花白、腰系白围裙、瘦瘦的老炊事员站在门口说：“打饭。”他脚下放着两个小铁桶。我们三个房客都愣着，不知道谁该去打饭。队长指着我说：“愣着干什么？快点过来打饭！”我赶紧拿了两个碗去打饭——大米干饭，肉片炒青菜。

两位同号惊奇地说：“病号饭！哥们儿哪不舒服？传染不传染？”“我没病啊！会不会弄错了？”我看着香喷喷的饭菜，不敢下嘴。两位同号说：“管他呢！吃了再说，就算错了，也是他们给的，不是你冒领的！”和他们俩比，我又显得“嫩”了。我一想，也对，就忐忑不安地把饭菜消灭了。

当天晚上，我吃的还是“病号饭”。两位同号说，不是弄错了，“你就应该吃病号饭。”第二天，每逢开饭时间快到了，那哥俩都躲到门后，竖着耳朵“侦听”简道里的声音，并说：“这个简道好像出什么事了！吃病号饭的人特多！”

不久，我得知这叫“营养灶”，每人每月伙食费为18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一天三顿，主食有大米粥、鸡蛋挂面、大米饭、馒头，偶尔吃包子，副食都是鸡蛋或猪肉炒青菜。逢大灶吃细粮、肉菜时，就和其他同号一块儿打饭。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同号们都不容易，咱不该搞“特殊化”，就经常拿馒头换同号的窝头吃。队长严肃地批评了几次：“这是国家给你的，你不能破坏监狱的规矩。”

到第四天，我又被带到预审楼过堂。陈忠原仍然坐在左边。另两位我不认识。中间那位比刘发还显老，头发白多黑少，瘦瘦的，高高的。右边坐着一位女士。自1971年4月6日市委党校礼堂那次大会以来，我再未见过世面，都忘记“女人”长的什么样了，就多看了她两眼：白白的，瘦瘦的，戴着眼镜，有三十多岁，非常文雅。后来我知道了，老爷子姓孙，那位大姐姓周，都是公安部的。

老孙问：“最近生活怎么样？”我说：“变化很大，吃上了病号饭，牢房的条件也略微好了一些。”他说：“这么长时间了，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增加一些营养，是必要的，别把身体搞垮了。”他问：“身体有什么不适吗？”我说：“没有，挺好的。”他问：“是不是奇怪，怎么换人提审了？”我说：“有点儿。”他说：“不要胡思乱想。我们有我们的安排，有我们的原则。告诉你也无妨。你也知道，我们介入外文局的案件，已经一年了，基本情况已经摸清。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你负责，我们决定换人，再从头至尾地审理一遍。在这期间，我们要求你继续反省，实事求是，有什么忘记的，遗漏的，记错了的，如实地讲出来。”我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老孙说：“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据我所知，有些事实你还没有讲清楚。不要着急，慢慢来，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可以随时通过看守所找我们谈。”

提审用了十多分钟时间就结束了。到1978年春天，他们三人先后找过我两三

次，每次所用时间都没有超过半个小时，除了追查1968年8月22日夜间的情况，就是问我的身体状况，最后一次，周大姐与我之间谈了一些家庭情况，她告诉我，“你爱人和孩子都很好。你爱人调到石家庄去了，孩子已经上二年级了。”她让我“放心”，把我整得心里热乎乎的，不禁想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一场中，小常宝撕心裂肺地呼喊“八年了”！八年来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老婆孩子的情况。

到1978年6月份，公安部调查组又换人了。刘发和“小平头”又开始和陈忠原提审我了。第一次过堂，他们张嘴就问我身体状况，谈了一会儿之后，刘发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说，你也能感觉到一些变化。我可以告诉你，有些涉案人员，已经陆续出去，回外文局了。”对此，我的确有些“感觉”。“但是，你不能着急！你的问题要比别人复杂一些，除了谋杀，还有反动言论。”刘发说。这倒不用他们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这时，过堂时一向不怎么说话的陈忠原插了一句话：“不瞒你说，李闯，你的逮捕令，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亲笔签署的，对外文局案件进行复查的批示，也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作的！”

我把一对小耗子眼儿睁得“像牛蛋似的”，瞧瞧陈忠原，又瞧瞧刘发。刘发没吱声，等于默认了陈忠原说的话。

刘发严肃地说：“把‘反动言论’问题搞清楚，还需要时间。”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终于接触“正题”了，需要时间并无大碍，只要有人管这件事就行——有八年“狱龄”垫底儿，还怕什么！

刘发让我“从头说起”，“实事求是”，“一件事一件事地讲清楚”。陈忠原也板着“菩萨”脸说：“过去的事儿，我听说不少。别看我们不认识，没打过交道，对你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有人说你是滚刀肉，有人说你是硬汉子，这些现在都不去管它！奉劝你不要再搞那些超额不超额的玩艺儿了！我所以告诉你一些内幕，就是想提醒你，别那股二杆子劲儿一上来，就把什么都不当作一回事儿！这一次，真的是中央说话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我默默地坐着，整理一下思路，接着，从1967年下半年的思想变化讲起，针对一件又一件具体事儿，都说了哪些话，以及王文政怎样让我配合，又怎样借“深挖犯错误思想根源”之名，分析、演绎、“上纲上线”的，一一如实招来。这一说不要紧，“小孩没娘，话长了！”他们偶尔打断我的话，追问一些细节。讲了小半天。我没累，他们大概累了，让我“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刘发让我“回去以后，好好反省”，并布置了“作业”，“把今天讲的这些，写成材料。”

那段时间，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李闯反革命小集团”的事儿，的的确确

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提审特别勤。刘发他们隔几天就找我一次。我一段一段地谈，又一段一段地写。“话题”非常沉重，他们的态度也非常严峻，但是我的心情异常的愉快。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那些事从头至尾捋了三四遍。最后一次提审结束前，刘发说了一些我老婆孩子的情况，又告诉我：需要什么东西，回去想一想，下次告诉我们。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沾沾自喜，不要怨天尤人，别以为自己没事儿！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骂过人，审查过人家，“有不少错误”，“群众对你们是有看法的！”他再三强调，希望我认真反思，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我说：“请你们相信，我这个人不打诳语。这个问题，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年了。像我这种人，就该回回炉。”我想借题发挥，顺便说“国家也该回回炉、补补课”，瞬间转念：“老毛病又犯了不是？不长记性，作为一个草民，就应该夹紧尾巴，这种事你管得着吗？”终于憋住了，未敢出口，接着说：“坐牢对我来说，也不算坏事儿，等于上了几年社会大学，学到了好多东西，当然，时间长了点儿，三五年比较合适。”听了这些话，他们略显惊讶，又若有所思。

接下来，陈忠原说：“还要正确对待你自己的那帮哥们儿。外文局搞了四起‘谋杀案’，涉案人员六十多，进班房的三十来人，其中只有包括你在内的四位同志始终没有承认是‘五一六’、‘杀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要是人人都能顶住，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他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刘发紧接着问：“是啊！你将如何与他们相处啊？”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非常理解他们！这么多年了，我反复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承受的压力还大，吃的苦比我还多，不怨他们！”

他们三个人都露出了笑容，刘发如释重负，说：“这就对啦！”

他们的提醒和规劝，使我加深了对群众、对哥们儿的理解。出狱以后，我一直坚持避免与同事、与哥们儿谈论那些过去的事情，从未向谁打听过那些案子是怎么编出来的，谁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直到外文局出版的“大事记”旧事重提，我琢磨，既然在外文局的“历史”上简简单单地说到了“李闯反革命小集团”，咱就应该将这件事的始末细说端详，免得“后来人”胡乱揣摩，添枝加叶。我拿起笔来记述那些往事时，也只是凭自己在隔离审查、坐牢期间，看到的、听到的写，没与任何人商量。

难忘的会见

1978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我被“小平头”和陈忠原带到预审楼，进了一楼朝北的一间大办公室，习惯性地坐在门边的方凳上。“小平头”和陈忠原却站在

门口没动。

这间办公室东西较长，门开在东南角，北面有两个大窗户，靠西头有一个特别大的写字台，旁边有刘发、周大姐等四五个人。

我刚坐下，刘发就对身边的一位女士说：“你们谈吧，我们先出去。”他出门前，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谈谈！”

我规规矩矩地坐着，等待过堂。坐在写字台后面皮椅子上的那位女士，高高的，烫着“飞机头”，满面春风地看着我。一个小女孩靠在她身上。离六七米远，我只觉得那位女士很漂亮。似曾相识，我却不敢贸然说话，毕竟“身份”不同么！她笑着说：“还愣着干什么？不认识了？快点儿坐过来，看看你的宝贝女儿！”音容笑貌和谐一统，才勾起我八年多以前的记忆：会是她吗？走近一看，果然是我妻子！

相对无言，默视良久，眼泪在妻子眼眶里一转，终于没有掉下来。她赶紧不无掩饰地俯身对翘首观望的小女孩说：“快叫爸爸！”

小女孩清脆地叫了一声“爸爸”，一下子就抱住了我的腿。那一瞬间，我的感觉真叫“难以用语言形容”！五脏六腑在体内翻腾起来，热血一个劲儿地往脑瓜顶上冲，嘴唇哆嗦，浑身微微发抖。到底在监狱里呆了八年，生离死别的事儿听的见的太多太多，自己也在鬼门关前转了好几圈儿，终于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我几乎是跌坐在“正座”的皮椅上，一米七二的妻子旗杆似地依靠在皮椅旁。当时我的那副惨相不难想象：比妻子矮三公分，剃着大秃瓢儿，浑身“狱味儿”，脸色苍白不说，还肯定由于激动变了形……而女儿窜到我身上，坐在我右腿上，搂着我脖子，一边亲我一边叫“爸爸”，还附在我耳旁悄悄说：“人家都有爸爸，就我没有，我早就想爸爸了，我也有爸爸了！”1970年，我到岳父家过春节时，她刚出生二十天，眼睛睁着却不认人。我拍了几张襁褓中的照片，并把它们深深地藏在心中。如今，她已经长得一米多高，就要上三年级了……

我们爷俩亲热时，妻子絮絮叨叨地述说着女儿的成长历程。我刚入狱那会儿，邻居们都劝姥爷，把孩子给人。姥爷视外孙女为掌上明珠，坚决不肯那样做。有一次，姥爷出去开会，孩子被一位公安局长的老伴抱走了。两天后，姥爷一回来，先看孩子，听说被抱走了，连口水都没喝，坐上车就找人家去了。到那儿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回来了。姥爷说了，她爸要是出不来，让二舅把她当亲闺女养着……女儿四五岁时，就整天玩刀弄枪，领着一帮男孩女孩，在干休所大院里胡折腾，爬大煤堆，钻防空洞，“无恶不作”，一天到晚，得洗三四遍衣服。姥姥训她：“小妮子哪有这么疯的？！”姥爷却看着高兴，根本不管，还给取了一个男孩子名字，叫“红军”。上一年级时，姥爷天天接送。老师常向家长告状：“你们家孩子淘气，还好吃零食……”七十多岁的姥爷就得在二十多岁的老师面前作深刻

检讨，表示“一定好好管管她！”可是，上学前，他还是往外孙女的衣兜、书包里塞吃食。

最让姥爷、姥姥受不了的是，外孙女总问：“我怎么没爸爸？”“爸爸到哪儿去了？”

妻子说，外文局原军管小组组长施诚，与强守一他们意见不同，被调回防化兵部，从防化兵学院调来政委杜万荣，接替施城。杜万荣和老爸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一个是教导大队长，一个是政委。杜万荣见案犯家属和受到冲击的人日子很不好过，就把老爸从石家庄找来，劝他把女儿调到身边去。老爸接受了杜万荣的建议，托人把我妻子调到河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单位和家仅一墙之隔。

杜万荣和强守一等人的意见也不合，不久也回防化兵学院了。施诚和杜万荣全身而退，下场算是好的。军管小组的大老李，公开地坚决反对强守一等人胡作非为，然而斗不过人家，结果导致精神失常，“疯了”。

外文局的情况太复杂。公安部调查组的人进驻外文局之初，无人敢和他们接触。他们第一次到石家庄去找我妻子，她也疑虑重重，到第三次才敢说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妻子说，强守一、王文政说这个是打手，那个是凶手，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法西斯！

“这次是周大姐通知我，来看看你，特意嘱咐带上孩子，还让我多带点钱，你可能需要东西。”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就到六点了。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下班了。刘发打开门对我妻子说：“让他回去吧，人家要下班了。”我起身要走，女儿抱着我的腿，仰着脸看着我说：“走，爸爸，咱们回家！”饶是“见多识广，铁心石肠”，哪怕是再多呆上一秒钟，我的眼泪也得“哗哗”地往下流。我挣脱了女儿的一双小手，哽咽着说：“爸爸还有事！”连头都没敢回一下，就径直跟着“小平头”和陈忠原，回“王八楼”了！

“老杀”们找强守一“对话”

平反之后，外文局的一些人和我们开玩笑，称我们为“老杀”，我们也不忌讳。尽管我因“反动言论”先行一步入狱，退后一步出狱，然而，由于“谋杀案”搞得声势太大，牵扯的人太多，影响面太广，拖的时间太长，很惹人注目，我的那顶“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帽子，反而无人说起。我倒以“杀人犯”著称于外文局了。我觉得，要不是“大呼隆”进去那么多人，又“大呼隆”都出来了，“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问题，肯定没那么容易解决。再者说，公安部调查组当时为我们平反，还是“冒了一定风险的”。那会儿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出山，召开十一届

三中全会也是后话。了解内幕的人说，我们的“案子”是周总理抓的，调查组的同志对此忧心忡忡。还是一位说话算数的“中央领导”同志发了话，不管谁抓的，有错就纠，给调查组的同志吃了定心丸。我认为，就凭这个，咱也不能给公安部的同志添麻烦。因此，我也不提“那一段儿”，乐得“混迹”于“杀人犯”之中，跟着沾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末代皇帝溥仪等战争罪犯获释出狱后，政府曾安排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游览。“老杀”们回到外文局后也享受了一段时间“特赦战犯”的待遇。外文局组织“老杀”及家属到大寨、东方红炼油厂等地参观，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

一天上午，突然接到通知：“老杀”到局大门口集合。我以为又要出去参观游览，高高兴兴地往外跑。在局大门口上了一辆大轿车，我才知道，这是“老杀”们自发组织的活动，“要去防化兵部，找强守一谈谈”。

汽车到了防化兵部，与门卫交涉了一下，开到大门内停下了。五十多个人，也没个正儿八经带队的，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如何才能找到强守一”。“三人行必有我师”，有个“明白人”见大家伙儿一筹莫展，便出了个主意：“到政治部去问问。”去政治部的人回来说，强守一没上班。正当大家无计可施、直转腰子时，冤家路窄，鬼使神差，强守一和老伴儿相携着朝大门走了过来，要出去办事。“老杀”们一拥而上，立刻开起了现场批斗会，言词激烈，情绪激愤。先后有几位军人过来劝止：这么多人堵在门口，影响机关工作……均被“老杀”严词喝退：“现在知道影响机关工作了？强守一影响外文局工作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管？！”有“老杀”质问：“他在外文局害死多少人，你知道吗？！”后来，有一位军人“因势利导”：“大门口不是办事的场合，我领你们换个地方！”在他的带领下，“老杀”们簇拥着强守一夫妇，进了一间大餐厅，继续声讨强守一的“罪行”。我觉得形势过于紧张，一旦“群众情绪失控”，万一把老强整出个好歹，弄不好还得回看守所，就与三位“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悄悄退场，躲在餐厅外面，爬玻璃窗“观战”。果然不出所料，餐厅里的“老杀”们越说越激动，对老强推推搡搡，几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老杀”，对其拳脚相加。大概其中有经验的人也担心把老家伙捶扁了，却又不好制止，就大呼小叫地“命令”强守一“站到桌子上去！”这样一来，强守一虽然当众“出丑”，却免遭了拳脚。

“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大多数“老杀”怀着胜利的喜悦，有说有笑地走出了餐厅，少数“老杀”仍然觉得“不解气”，愤愤不平，走出餐厅时，似乎对强守一还有点儿“恋恋不舍”，总是一步三回头……在这之后，有些“老杀”结伴去探望第一任军管小组组长施诚，还有“疯了的”大老李。我与施、李没打过交道，没啥交情，在大门口的汽车里坐等。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去防化兵部“拜访”强守一之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他的独生子、现役军人，竟然猝死在篮球场上，“享年二十七岁”。“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黑发人送白发人，乃人生之大不幸，对强守一来说，也算是“因果报应”。强守一绝了后，把悲痛化成怨恨，将一股邪火发泄到外文局“老杀”们的头上，又奋笔疾书，向中央打报告，说他编的那些案件“都是真的”，遭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主管党和国家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愤怒地说：“强守一再胡闹下去，就把他关起来！”

由于全国各地屡屡发生地方群众到部队揪斗原任军代表的事件，不久，中央发了红头文件，严令禁止这样做。

1980年1月，我举家迁入前三门新居。春节期间，陈忠原打电话，给我拜年，并说：“防化兵部领导派出慰问组，来慰问受过迫害的同志，想到你家去看看。”我说：“算了吧！都是当兵的，用不着来这一套！再说，强守一干的坏事，和防化兵部没关系，用不着他们为强守一擦屁股。即使强守一，我也犯不着跟他较劲！”陈忠原高兴地说：“小李子，正因为你有这种态度，才更应该去看看你！”我说：“得了吧！我不计较，就不用费那事了！”陈忠原说：“不瞒你说，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怒气难消，坚决拒绝慰问，即使表示愿意的，我也担心让人家下不来台。防化兵部领导既然有这样的好意，咱们不有所表示，也显得太小气不是！”我说：“老陈，我听出来了，你有些为难，那就带他们来吧！”

防化兵部政治部副主任和一位干事，被陈忠原带到我家。他们说了很多客气话，我也一再表示：都过去了，不会放在心上的，“同那些遭了数十年罪的‘右派分子’相比，同那些在‘文革’中吃了十年苦的人相比，同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致疯、致残、致死、妻离子散的人相比，我在监狱里生活八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吃穿不愁，又算得了什么！”副主任说：“本来我们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为强守一同志晋职。你们去兵部之后，我们首长才知道强守一同志都干了些什么，立刻把晋职报告撤回来了。”我说：“这是一件好事儿。强守一这种人不适合委以重任！”胡耀邦怒斥强守一的事儿，就是他们告诉我的。副主任他们带来一些营养品，还有一件纪念品：一只褐色的展翅瓷鹰，旁边插着一支钢笔。我把营养品吃了，“鹰”一直摆在书橱里，留个念想儿。

1978年秋冬之交，我萌生了“找王文政老小子聊聊”的愿望，想同他探讨一下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的有关“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些问题，看他如今有何高见。于是，我约上两位既善辞令、又不爱动手动脚的老哥，到总后勤部去拜访他。在总后勤部东大门，我们向警卫展示了单位的介绍信。他通过电话联系后，让我们仨进去，并告之“如何走”。我们穿过一片鲜花绿地中的甬道，来到一排朝东的有外廊的平房前。一位军人详细询问了来意，说：“请等一下，我

去找找看。”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对不起，他不在。”随后，以商量的口气说：“要不，你们先请回吧！”我们知道“这是有意推托”，悻悻而归。后来有人告诉我：“王文政反总理，被审查了！”我不禁脱口而出：“操！原来是贼喊捉贼呀！”

从那以后，我一猛子扎到业务堆里去了。不久，有哥们儿向我通风报信儿，在新街口和护国寺一带，看见王文政遛弯儿，“他大概就住在那一带，可能已经‘下楼’（解除审查）了，你不想再找他谈一谈？”我对王文政已经失去了兴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改革开放”了，真的要把一度缺的课补上了，毛主席在四卷本儿《毛泽东选集》中反复论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将破土发芽，曾经被誉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同志，当含笑九泉了。我已经没有和他“讨论”的必要了。